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

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

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

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牖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

军”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

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 1862 年任江苏巡抚到 1901 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

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 1861 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掉、

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

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

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点评。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1862 年初，由于曾国荃昧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执意要夺得攻克“天京”的头功，因而拒不接受其兄要他率兵缓解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之命，李鸿章得以离开曾国藩

回乡组建“淮军”援沪，稍后被任命为江苏巡抚。由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最终成为晚清“第一重臣”。

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空降”当官的。面对当时混乱腐朽的江苏官场，他用种种方法、种种机会大力整顿，任命廉洁、开明、能干的郭嵩焘、冯桂棻等一千人马在关键岗位取代原来官员。事实证明，他看人眼光确实老辣，所选得当，郭、冯不仅成为他的得力帮手，后来也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的重

要人物。

为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有些官员敢于做事，但疏于自保，结果“成就”有限；更多的官员则是精于自保，而不敢或不愿做事。在新旧交替、社会深刻变化的时代，更需要官员敢于创新“做大事”；但这种矛盾交织、新旧冲突剧烈的时代，“做事者”往往更易受到种种强烈的抨击和指责，更难自保。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

他才能在云谲波诡的时代成为朝廷不得不深倚的重臣。从新官上任大力整顿地方起到后来大办洋务、权倾一时，李鸿章经常受到各种指责、抨击，有时甚至“弹章蜂起”，但他大都能想方设法、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是在晚年甲午大败之后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朝廷正好让他成为“替罪羊”而实际剥夺了他的一切职务；在随后的“维新变法”中，他因同情维新派而在年近八十高龄之际、在隆冬腊月被慈禧严命

去黄河入海口“勘河”。他深明守时待变之道，不辱使命，兢兢业业完成勘河任务，同时又静观局变，抓住时机，终于东山再起，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在紧接而来至为惨烈的“庚子巨变”之中，他又被委以与列强议和、挽救清王朝的重任。此时此刻，一个腐朽透顶的王朝的存亡几乎系其一身，责任与权势之大，均为空前。他颇以此得意自豪，然而对他而言，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时年61岁。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的悲哀之情也流露无余。他在挽联中痛悼：“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他的哀痛无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曾国藩对他确有“知遇之恩”。但曾、李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极其复杂：由师生、主宾变为上下、同级，可谓多重。儒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生之伦”，他们都以儒学正统自居，自然要践行“师生之伦”；但后来又是官场中的上下级乃至平行同级的官员，各有各的利益需要维护，不免也有矛盾。如何处理师生伦理与现实的官场逻辑，颇为微妙。当然，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他们在维护洋务派和

“地方”利益方面，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与“中央”的博弈中更多地是互相支持，彼此引为奥援，总体而言配合不错。因此，将曾、李关系全面梳理一下，确是饶有趣味之事。

曾李关系可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因此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在未中进士之前，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

“义理经世之学”。1845 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中，但诗文却得到曾的赏识。李鸿章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稍后对李瀚章说，这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常向曾请教。1853 年，李鸿章之兄李瀚章进入曾国藩幕府，襄办湘军粮台，而李鸿章则回到安徽老家帮办团练，镇压

太平军。

几年下来，本想大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落魄潦倒之际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 1858 年底来到江西曾国藩大营，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

反复说情，李鸿章终在 1859 年 1 月入曾国藩幕，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

在曾国藩幕，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牘、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历任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长子，其弟即大名鼎鼎的翁同龢。这道参折指责翁同书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以翁家的权

勢，要將其扳倒談何容易，所以曾國藩極其重視，要文案房多擬幾份草稿備選。在好幾份草稿中，他選中李鴻章稿。如此重要之折，却只區區不到六百字，可謂字字千鈞，句句見血。此折歷數翁同書忠奸不辨、誤用歹人、措置失當、貪生怕死、連失兩城的罪狀，然後指出翁的幾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處，反駁他的種種自辯，令其無繼續辯解的任何余地。此折最後寫道：翁同書有如此行為“豈宜逍遙法外？應請旨即將翁同書革職拿問，敕下王大

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即将朝廷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本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封死，委实老辣。朝廷只得并不情愿地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所以曾国藩称赞说：“少荃天资于公牖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李鸿章也向人表示自

己从前也辅佐过其他将帅，但“茫无指归”，入曾幕才“如识南针，获益匪浅”。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

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

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在曾幕，李鸿章不仅仅是起草文牒，而是参与重要军机。如 1860 年 9 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响，而且这时正

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曾国藩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于是令下属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但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确非寻常。他进一步论述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对北

上驶援应“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经过仔细权衡，曾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对李更加器重。李鸿章对曾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经常因固执己见而时有冲

突，曾几次想离曾而去。1860 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早在 1853 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入

曾幕，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的恩人。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但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在浙赣边界游荡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曾幕，但并不束身待罪，而是不久又径自离去。凡此种种，曾国藩决定具疏

弹劾，以申军纪。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

“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扬长而去，离

开曾幕，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此事使曾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李鸿章在江西并不顺利，而经过胡林翼、沈葆楨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其实也想再回曾国藩幕，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便

写信致贺。以曾的历练，一眼便知此是回心转意的试探，便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混了七八个月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再回曾幕。

事实证明，对李鸿章而言再回曾幕绝对正确。回营不久，曾就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驰援上海，稍后又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江苏巡抚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但在事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李则并不完全服从、相让。如1862年无为等地吃紧，曾国藩扣留

了淮军新建的九个营增强防卫，但李鸿章却再三坚持要将这九营送到上海。最后曾国藩只得同意，并写信给李希望他能谅解。

当然，在许多方面李也对曾有体谅。如 1863 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却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

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深谅曾国藩的困难，所以甘冒被朝廷责备之险而一再拖延，不使曾为难。

从很多地方也可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曾、李关系大体

不错，特别是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互相配合。甚至在李鸿章的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这一“言”即与洋人打交道的关节就在一“诚”字。原来，在

李鸿章接替曾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他曾向曾国藩请教，没想到曾国藩先问他有什么主意，他只好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然后缓缓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

“诚”字。李鸿章接着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不论曾国藩所说与外国打交道只用一“诚”字对不对，也不管李鸿章是否真的按曾氏所说行事，以李此时的地位之高与他人谈起曾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并毫不讳言曾对自己的批评，足见他对曾的敬重、足见他们关系的不一般。

曾、李的密切关系，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晚清权力开始“下移”，地方开始“坐大”。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

1865 年 5 月下旬，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但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捻军部分主力西进河南，且有再往西行的动向，但曾部已无力西顾。清廷惟恐捻军西进与西北回民起义军汇合，于是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准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

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也心有不甘。而独立于湘淮系的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所以在慈禧垂帘听政后甚得恩宠，官运亨通。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清廷此项决定，可谓一举数得。

对清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而李宗羲、丁日昌或是“才略稍短”或是“资格太浅”，难胜其职。此时，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才刚满五个月，更不愿受领此命。在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商量对策。他认为如果慈禧亲信吴棠署理江督，其“用人行政或多变局”，恳请曾国藩“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仰祈熟筹密陈”，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人

事安排意见。他提出或以胞兄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以丁日昌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瀚章署理江督，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当然，他也知道人事敏感，自己妄议并不妥当，同时表示“此非鸿章所敢与闻”。但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不住提醒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仅过了两天，他又给曾国藩写了此信，提出最好是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希望能按

李宗羲(字雨亭)建议，曾、李对调；虽然曾国藩曾表示过“决不回任”，但李鸿章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剿捻，会有贪恋两江总督之位、躲避艰巨任务之嫌，所以劝曾“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拟，请以鸿章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很明显，他们的“底线”是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

几乎同时，他在给友朋的信中更坦率地写道：“鄙人于西北形势生疏，而所部各军尽调归爵相四镇

之内，冒昧前去，非特迁地弗良，岂忍夺爵相已成之局。诸将闻弟视师，必皆舍彼就此，一军两帅，牵制殊多，况饷源全恃吴中，付托非人，转运接济终必匮乏，恐于前敌无甚裨助，而东南全局先自动摇。”他知道，“一军两帅”从来是用兵之大忌，将领将在“两帅”间无所适从，贻误军机；而更难办的是，因为“裁湘留淮”曾国藩剿捻的精整部队系以淮军为主，如果自己去后这些将领实际将唯自己的命令是听，而不大会服从曾的指挥，将给

曾造成不小麻烦。此点，也可看出他对曾的体谅。另外，“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与曾当然极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鸿章在11月25日覆奏，陈明不能率兵前去剿捻的种种理由。而且，由于曾国藩坚决表示不愿回任，因此无法“对调”。结果，清廷只能维持现状，居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

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终使朝

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了对“两江”的控制。这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也反映出晚清政治格局中以曾、李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崛起。

从 1865 年 5 月底接到北上剿捻的命令，到 1866 年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国藩的剿捻以失败而告终。朝廷丝毫不理会曾氏屡遭败绩的种种苦衷，丝毫不念及他镇压太平天国的汗马功劳，而是多次严旨切责。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氏受到廷寄责备七次，御史参劾五次，

由于连吃败仗又屡遭朝廷严责，曾国藩终于感到衰病难持，告假休息。朝廷却顺水推舟，在他休假期满后仍要他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陛见一次，而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鸿章署理。但令人寻味的是，要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前去剿捻的谕旨却未提及由何人接替李鸿章的两江总督之职。这有两个可能：一是李鸿章仍兼任两江总督，二是以后任命他人。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

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当然，他认为如能任命曾国藩重回江督之职，则于公于私最为理想。但曾国藩以老病告假，不能剿捻何堪两江总督重任？清廷对曾国藩本就防范有加，现在更不满意，又如何可能让他再担江督重任？

李鸿章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在1866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二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

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他指出曾国藩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说“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国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捻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

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他深有体会地强调说：

“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难接济。”接下来的一句，看似无意，其实却透露出之所以再三强调军需粮饷重要性的具体目的：

“曾国藩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谆切恳劝，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然亦以剿捻全军专

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与臣再四密商，迄无嘉谟可以入告，是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为区处矣！”总之情况就是这样，请朝廷权衡决定，实仍表明希望朝廷让曾重回江督之意。他进一步对朝廷明言：“今谕旨并未令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件，而询及应否移扎豫境”，如果率兵打仗与两江筹饷二事都要我兼任，那我到远离两江的河南就无法兼顾两江，必将误事，而“后路根本重地，皆新复之区，又多通商口岸，设有蠢动，

更难兼顾。臣反复推究事理，务求一是，纲领全在得人”。最后他明确说道：如果“皇上若仍令臣兵饷兼筹”，那我就只能前进到徐州为止。如果“皇上专责臣以讨贼”，我不必兼筹粮饷，当然可以进兵河南，但朝廷一定要解决粮饷。因为“在本境可兼管地方，驻别省即不能兼管地方。如不兼管地方，军需当责之何人，缺乏当如何处置，非一二空谈能有实济”。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国藩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

廷不能不认真考虑。

看到李鸿章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清廷只能谕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奉旨后，李鸿章立即于1866年12月19日写了《谢授钦差大臣沥陈下情折》。此折与前折相距半月，由于朝廷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所以此折的主要目的利用例行的“谢恩”对自己在前折中对朝廷的施压有所挽回。他诚惶诚恐地表示接旨后“当即恭设香案，望阙

叩头谢恩”，以前想到前线又感到“后无付托，日夜辗转，悚惶万分”，现在“仰蒙皇上洞鉴，两江所出饷需，实关剿捻全军命脉，特命曾国藩回任筹办，俾臣后路无掣肘之虞。圣慈曲逮，俯察艰难，无微不至，臣等应如何感奋，复何敢稍有推诿，致误事机？谨当恪遵谕旨，俟曾国藩回任后料理交卸，驰赴前敌”。当然，曾国藩回任仍有客观困难。因他不久前以衰老病多，不堪公务繁重，不能见客、阅读公文，病情短期内不得好转等为理由

陈请开缺，怎好立即就回江督任上呢？精明老练的李鸿章当然能想到此点，所以紧接着就替曾国藩圆场说：“臣熟知曾国藩积劳久病，时形衰惫。其前奏不能见客及畏阅公牒等语，皆系实情。屡接来函，深以地方公务烦重，精力不支，必欲坚辞回任。臣虽专函商恳，但既叠请开缺在先，亦自恐贻误于后，其素性耿介，量而后入，固久在圣明鉴照之中。”由于曾国藩仍随军在营，一时难以或很可能是仍感不便立即回金陵就任，李鸿章又于 1867

年2月23日给朝廷上了《请飭曾国藩回任片》，再次替曾国藩圆场。他写道：“曾国藩久劳于军，所称衰病情形，实无捏饰。”不过现在“惟感蒙圣主倚畀之隆，臣复仰体眷怀，以大义相劝勉，似可力疾任事”。并一再强调：“长江千里，番舶如织，游匪横行。自臣去金陵后，时恐小有蠢动，回顾不及。督臣必须常驻省会，坐镇四方。”他说曾国藩迟迟在营不回一方面是协助他剿捻，一方面是顾虑“回任迹涉畏难取巧，具见公忠尽抱，贞介

素心。臣亦深为感敬。”但他仍强调“臣在江年久，审知后路筹饷察吏，督臣综揽大纲，不可远离”。所以在他即将远赴豫、鄂时，“仍乞圣明敕令曾国藩早日回省，久于其任。则东南已成之局不致败坏，即中原方、张之寇，终可殄除。通计天下大势，关系良非浅鲜。”这三则奏折，他一步一步地得出了曾国藩回任江督是事关“通计天下大势”的结论。

通过这三个奏折，李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国藩

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在后方筹饷，李可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虽然曾、李也时有矛盾，但那毕竟只是“自家内部”的矛盾。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

1896 年，李鸿章自欧美风光风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亟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未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 1896 年 10 月 24 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

相”，落差何其大也。对此任命，李鸿章当然老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不仅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

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龢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

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1895 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

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

“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途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

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龢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

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覩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

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从 1895 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 年 1 月 24 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

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

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

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

“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

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惟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此议

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

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

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

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而近日康有为的所作所为，实是扩充李鸿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梁在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

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

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1861：清廷、洋人和太平天 国间的“三国演义”

在镇压太平军的血腥战斗中，以当时十分先进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由侵略中国的“洋人”组成的武装，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给清军以重创，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仓皇出逃，皇家名苑圆明园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

约……清政府与这些侵略者本应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但曾几何时，侵略者枪炮的硝烟未散，不平等条约的墨迹未干，却突然“中外和好”、“借师助剿”，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与内乱间清政府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对内对外方针发生了哪些改变？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敌友关系也如此变幻莫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各级官吏、地方势力的作用如何，有何自己的利益？中外

之间怎样合作又有哪些冲突？再具体而言，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他是如何考虑的？亲办此事的经历和一些具体事件又给了他哪些影响？

这些，都须从头说起，慢慢道来。

在对外方面，对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焘、冯桂芬一直就“主和”。郭认为“夷”“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冯更曾明确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复东南。但应者寥寥。而据守东南的一些封疆大吏

在太平军的严重打击面前，多次请奏，提议借“夷兵”助剿，认为不如此根本无法剿灭太平军。对此提议，咸丰皇帝勃然大怒，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

1860 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清王朝确实岌岌可危：北方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

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訢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使中央政府对侵略者有了较多的了解。经过一番“谈判”，备受侵略者侮辱的奕訢终于与侵略者“议和”成功，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訢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

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是“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清廷着实感到意外，对侵略者最终

要“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对外认识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奕訢一人，某些官员和士大夫也开始作如是观。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远用于中国，“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虑”。名士李慈铭也认为：“窃谓夷以数万里外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京津间广大地区都被他们控制。

如要侵占土地早就占了，但他们竟“往返请期，惟和是议”，其目的显然不是占地。与前相比，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訢，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清中央政府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訢与其他几名重臣会衔上了《统计全局折》，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新认识。此折在回

顾了清代“夷祸”之惠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

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的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

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貽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咸丰帝于 1861 年 1 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标志新国策的正式施行。

从维护清政府统治来看，此折确实战略分析透彻，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这一重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

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 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

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

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漕运总督袁甲三就公开反对，上奏提出现在的中外“和约”只是暂时的：“夫战不胜，则和不久；虽暂时言和，亦必终归于战。”如果借用外国军队，等到消灭了太平军后，“外夷”都会提出格外要求，结果“一旦奉命而来，久居内

地，是不仅引虎入室”，“况此日招之使来，他日不能挥之即去”，所以此举是“有害而无利”。对朝廷此项重大转变，曾国藩也不甚赞成。1862 年曾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 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

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

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

“洋人缠鬻，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

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伎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

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睬，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种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

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铃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

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的权势和清政府造成威胁，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藉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性情较华尔更加肆横，与吴煦、杨坊等渐有矛盾，吴、杨则以拖欠军饷对付他。1863年1月，白齐文从松江带卫队回到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杨拒绝。结果，白将杨痛殴一番后，抢去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知情后以“不

遵调遣，劫饷殴官”之罪名将白齐文革职。白自然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将其复职。但清政府认为，若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实无理由，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许白复职。李鸿章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中强调：“外国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难驾驭”，但白齐文已自请加入中国国籍，已受朝廷的三品顶戴职衔，“违犯法令，应照中国之

法治罪，以杜后患”。他说自己对“常胜军”是“曲意笼络，俾为我用”，但又担忧，“惟常胜军人数过众，犷犴难制”。他提出要由中国官员会同管带。当然，他决不会同意仍由吴煦等人插手此事。在此显示出李鸿章权谋老辣的是，在这则因白齐文殴打杨坊而要将其严处的折片中，李鸿章竟提出还要严处吴煦、杨坊。因为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该道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钤制，办理不

善，咎亦难辞”，所以此二人暂行革职。

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又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意在平息外国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但想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并不容易，因为撤掉白齐文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方面对“常胜军”一直由美国人指挥始终不甚满意，早就在“常胜军”中安

排一些英国人。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作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交涉，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此协议有十几条之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但中国放弃了

英国管带如有过失照中国法律规章办理的要求。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去战斗必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此点被李断然否定，后改为如到百里以外作战则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临近作战可自主决定；其次是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胜军”最少要五千人，而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所以力主大量裁减。最后双方妥协，同意以三千为度，若

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决定从简，并且规定购买军火须有江苏巡抚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带官意见。

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当然，实际是戈登独揽大权。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

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此次正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

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
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
条件；尽可能地裁抑了“常胜军”，
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貽患
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
了更大的发言权。真可谓一箭三雕！

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

在与洋人打交道中，美国人白齐文是最令李鸿章头痛的一个，双方最后剑拔弩张、反目成仇，彼此欲将对方除之而后快，这一段恩怨最终以白齐文“覆舟溺毙”了结。不过白齐文真的是“覆舟溺毙”吗？此事的确不无可疑之处。如果不是“天道”而是李鸿章等人设计杀白，则反映出他们狠毒异常，故有必要详述此事原委。

白齐文于 1836 年出生，生性喜

欢冒险，少年时就有到东方创立一个帝国的梦想，青年时开始周游世界。来到中国时正赶上华尔在组建“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白齐文就做了他的副手。华尔在1862年9月被太平军打死后，清政府任命白齐文管带“常胜军”。白齐文性情暴烈，与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屡有激烈冲突，被李免职。

白齐文被免职后心有不甘，几经努力想官复原职，但均被李鸿章严词拒绝。忿忿不平的白齐文转而在于1863年7月初从上海赶到苏州，

投奔太平天国，一方面想报复清政府对他的“不公”，一方面仍借机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到苏州后，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接见了，表示接受其投诚。太平天国将他的名字改译为“白聚文”，成为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当月下旬他又回到上海，招集旧部陆续前往苏州转为太平天国服务。8月初，他约定曾在清军小炮船“高桥号”当船长的钟思和其他几个人在青浦抢夺“高桥号”小炮船，驶回苏州，为太平军服务。谭绍光对他颇为信任，挑

选了两千多人交他训练，但因外国军官人数不够只训练了一千多人。不久，他到天京谒见忠王李秀成，想要支部队归他指挥，并可单独行动。李秀成对他款待非常热情，并让他住在天王府中，临别时又隆重设礼相送，但却未答应他要独立指挥权的要求，命令他仍只带领自己原有的一小队人马。

由于白齐文在“常胜军”官兵中威望较高，其中一些人也想投奔他。对此，李鸿章和戈登都大为紧张，加紧了对“常胜军”官兵的控

制。李鸿章在 1863 年 8 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惟白齐文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强调已经“札行”美国驻沪领事，要其尽量抓捕、解办白齐文，“并商令戈登、程学启等严为防备，通飭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由于清方防备严密，白齐文几次为太平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

由于无权独立指挥大部队，只

能指挥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桥号”小炮轮，白齐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备受限制。眼见局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议。这确是太平天国当时挽回败局的正确战略，故为李秀成采纳，并在苏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苏州失陷后李又赶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全面奏，但此建议被洪秀全坚决拒绝。白齐文率领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伤亡日增，最后只剩下四十余人，

且大半负伤患病，许多人要求离去。白齐文请示谭绍光后，同意他们离去，在1863年10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盘缠、路凭，并准备了一些船只，而对少数自愿留下的则“相待如初”。几天后，白齐文旧病复发，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对他的要求，谭绍光也痛快地答应，并担心他在路上会被李鸿章俘获杀害。对此，白齐文回答说戈登保证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齐文走时，谭绍光以隆重的军礼相送，并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

还给戈登写了一封信，说明白齐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将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疗。这一切都使白齐文深受感动，到上海后他就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1864年春，他又从日本潜回中国，因上海一直对他严密防范，这次他改从宁波登

陆，终于成功。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消息传出，清方大为紧张，加紧了对他的防备，他的意图终未实现，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 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投奔前往。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遥的厦门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厦门海关俘获，送清军郭松林部关押。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翻译中国人细仔和英国人克令，他们一行被押送福州监狱。

抓到白齐文，李鸿章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为高兴，认为去掉一心头之患，他们认为“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因此决定将白从福州起解，押往苏州。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兰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细仔、克令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

此事端的是蹊跷。因为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近代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

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理，因此清政府无权审理白齐文案，只能交美国领事审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些，在此折中写道：“查白齐文叠助粤西发贼，谋害中国，按律久应诛殛。此次仍敢潜入漳州内地，投逆被获，本应立正典刑，即美国公使卫廉士，亦有白齐文既经投贼，已失体面，美国不应庇护之语，特以监禁听候严办。”他不无得意地说白齐文翻船溺毙，“虽中国未申治罪之权，而该犯穷凶极恶，致伏冥诛，足见

天道之不爽”。如此凑巧，果真是“天道之不爽”么？对此，当时就有人表示怀疑，认为很可能是李、左等人怕美国公使坚执领事裁判权，将白齐文交美方审判后不会受到严惩而设此毒计，不是“天道”，而是“人事”。上海的外国人和报界舆论就认为白齐文是被害死，而近人陈锦松在《松沪从贼纪略》中谈及此事时写道，白齐文被“闽关获之，送郭军门松林行营，郭不敢杀，械送过桐江，舟覆而死，或曰，亦委员以计杀也”。而李鸿章在刚刚

抓到白齐文时给朝廷的《拿获白齐文片》中咬牙切齿地写道：“查白齐文穷凶极恶，叠次甘心助贼，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营中拿获，若当时作为对敌杀死，可省葛藤。该提督等因系洋人及税务司公同盘获，无法消弭，既经解闽讯办，恐未便即予骈诛”。他遗憾没有机会将其作为战斗中的敌人打死，承认由于当时还有捉拿白齐文的其他洋人在场，郭才“无法消弭”。但他仍不甘心，向朝廷请示“应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将白齐文正法，余

犯解交该领事严办。抑俟敕下总理衙门与美公使反复申明情节，诘以如何严办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辩之处，均候旨饬遵，臣未敢擅便。”对白齐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跃然纸上。这些均表明李鸿章等确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如果真是他与左宗棠等人设计杀害，则足证其性格中狠毒无情之处。

或许是考虑到白齐文给自己添了太多的麻烦，同时更不愿因此破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美国政府并

未深究白齐文死亡真相，而且自愿放弃了领事裁判权。此案就此了结。

虽然很多因素表明很可能是李鸿章等设计杀白，但毕竟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证据铁定无误地证明白确是他们所杀。此案，可能成为永远无法水落石出的历史之谜；在人类历史中，这种无解的历史之谜又何可胜数！

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

初次接触：中日外交之一

1870 年，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从制度上获得了参与全国性外交活动和决策的权力。而就在他履任之前，日本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上任之后的李鸿章立即卷入了对日交涉。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

外交的“开端”，尤需详细理清。

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日本大门前，中日两国都实行锁国政策。但中日两国大门在近代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尤其是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日本政府便开始试图努力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而日本此时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

位于中日之间的朝鲜当时当然

是独立国家，但按传统“宗藩”体制，又是中国的“藩属”或曰“属邦”。朝鲜国王即位时要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要定期派官员前来中国向清朝皇帝朝贡；而清朝皇帝则有义务维护朝鲜国王的统治，帮助其平定内乱，抵御外来威胁侵略。按照日本的战略设想，征服朝鲜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因此，它首先想与朝鲜建立邦交，插进立足点。但日本的要求被朝鲜拒绝，于是日本转而实行“日清交涉先行”方针，

想先打开与中国关系再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巨大影响压服朝鲜。

1870 年 9 月末，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刚任直隶、尚未兼任三口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并通过成林将日本外务卿的书信转给北京的总理衙门。李鸿章在 10 月 3 日，即会见柳原前光的第二天，就写信向总理衙门通报了会见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

李鸿章的信中看，柳原前光“礼貌词气均极恭谨”，提出“英法美诸国强逼该国通商，伊国君民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虽于可允者应之，其不可允者拒之。惟思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民心协力”。柳原前光这种日中联合共抗西方列强的狡猾说辞明显打动了李鸿章，再加李对日本开始迅速学习西方原本就大有好感，因此在信中赞扬日本道：“鸿章前闻日本与英法通商立约，简严特甚。海关不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

即此二节，已杜许多后患。又购求泰西机器兵船，仿制精利枪炮，不惜工本，勿谓小国无人。”因此他对日中联合颇为赞赏：“与之深谈西事，似有大不获己之苦衷。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华文，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同治三年曾颇有远见地提醒人们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

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

然而日本使臣的几句好话就使他认为中国应该“联日”抵抗欧美，作为外交的重要方针。当然，他认为与日本应另立条约，但不能按照与西方各国所订条约，即日本不应享受中国给西方列强的特殊利益。

总理衙门起初准备同意准许日本通商，但不与日本“立约”，然而在李鸿章的影响下，决定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商谈订约之事。日本达到了其最初目的。但是，对是否与日本通商、订约，清政府

内部却有不同看法，安徽巡抚英翰就上折坚决反对。为慎重起见，朝廷将英翰的奏折寄发疆臣，征求意见。对此，已兼任北洋大臣因而“名正言顺”地负责对外交涉的李鸿章于1871年1月18日专门就此事致信总理衙门，再次申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明代虽有倭寇屡犯中国沿海，但自清初建政以来就很少侵扰中国，说明清政府“制驭得宜，畏怀已久”。咸丰朝以来内有“粤匪滋事”，外有“西人迫胁”，但日本没有乘机侵扰中国，也没有借

此机会要求与中国“立约”，“可见其相安无事矣”。而且，日本与朝鲜、越南不同，不是中国藩属国，因此可与其立约，以求“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结”。针对英翰对日本会“入寇”内侵的担忧，他反驳说：“至虑该国入寇与否，似不在立约与不立约。使其意在入寇，不准立约愈可藉口寻衅；使其意在乞援，准与立约正可因之弭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约后中国可派“大员”长驻日本，“平素究知国风与之相习，将来情

谊日密，耦俱无猜。设一旦西国有事，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当然，他仍强调立约的内容应与西方各国不同，不能按日本要求“一体均沾”。

三天后，即 1871 年 1 月 21 日，李鸿章便上了《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此折观点与给总理衙门信中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作了简化、概括处理。然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他认为日本“安心向化”，但在此折后面注意到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

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他相信通商立约后中方“可“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他的看法，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当然也得到了清廷的赞同。清廷要李做好与日本谈判立约的准备，李督飭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详细研究日本情况。

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更加注意日本情况，对日本开始有所担心。在 1871 年 4 月 9 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东洋与中土最近，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并对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开始警觉。原来，一艘美国商船于 1866 年冒险进入朝鲜海域，被朝鲜烧毁，此时美国派一艘兵船到朝鲜“理论”。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并有日本兵船亦约同往，如高丽不与通商，其势必得打仗”。他认识到“日本欲吞朝鲜已久”，历史上曾数次入

侵朝鲜都未成功，现在则有可能联合西方各国打开朝鲜大门。“日本与西国情好渐密，与朝鲜猜衅较深。彼既通商，朝鲜恐不能独抗，抗之则日本尤为朝鲜之近患。”在随后的对日谈判中，他对此点尤为注意。

1871年7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升任外务大丞的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天津同清政府谈判。中方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应宝时、陈钦随同帮办，与日方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采取了让应宝时先与伊达宗城副手柳

原前光反复辩争，然后自己再出面与伊达会谈的策略。在与伊达的会谈中，他对伊达“翹然自负”、盛气凌人、蛮横无理的态度极为反感，亦声色俱厉地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此时，他对日本的迅速发展虽心有所佩，但毕竟还未摆脱中国传统的轻日心态。对日本要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加给中国一个不平等条约，如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要求，中方断然拒绝，表示中日间不能以“西约”为例，中日应缔结平等条约，不能有来无往。由于日本此时

羽翼未丰，不足以凭实力威胁中方让步，最后大体以中方的草约为基础达成协议。9月13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这是中日间缔结的第一个、也是平等的条约和通商章程，主要内容是两国互派使节；彼此指定口岸任商民往来贸易，此国商民不得到彼国除开放口岸之外进行贸易活动；中日两国对等地各在对方享有领事裁判权，这同欧美各国在中国、日本单独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情况完全不同。总之，日本

希望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内地贸易权、与欧美各国一样在华享有特权的要求都未能实现。但是，日本的主要目的虽然未能实现，不过却达到了它的另一重要目的，即它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就得到了对中国的“属邦”朝鲜打压、威逼的有利条件。

对这一点，李鸿章还是有所警觉的。这些双方基本平等的条约有一条格外反映了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担心。因李此时对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已有认识，所以

想以条约形式加以遏制。《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而另一条则隐约透露李鸿章的另一意图，这一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商友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此条虽是中方从 1858 年《天津条约》第

一款引用过来，但李早有与日本“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的想法，故此时照搬此款亦非完全无意。

李鸿章认为立下条约即可保证日本不侵朝鲜、更不可能进犯中国，因此在谈判尚未结束时在 8 月 30 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就乐观地写道：

“总之束约铁案已定，纵欲倚西人为声援，断不能转白为黑。”但事实几乎立即无情地证明李鸿章过于乐观、过于相信日本、过于依赖条约的约束力。实际上，双方签约墨

迹未干，日本就“转白为黑”、要求修改条约，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活动。

以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因此，联合日本抗拒西方是外交方针、国际战略的根本性错误。如此巨大的错误判断，显然是对日本的实力之强和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对日本的野心之大认识不够，但从根本上说是对世界大势、中国将面临国际环境和格局缺乏深刻的洞察。

平心而论，李鸿章对“外面的世界”的认识无疑超出同时代绝大多数官员，然他尚做出如此决断，表明清王朝确无能力对世界形势做出正确把握和判断。

就李鸿章个人而言，他以“知洋务”著称也以此自诩，曾与华尔、戈登、白齐文等洋人打过不浅的交道，用尽种种手段，对这些洋人确实“驾控自如”、为己所用。因此，他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谈到自己与洋人打交道时颇为有效的“痞子手段”。然而事实说明，这种“痞子

手段”可能有用有效于一人、一事、一时，但若对世界大势缺乏认识、判断错误，则无论“痞子手段”多么成功，都不能挽救全局的灾难性整体失败。

台湾事端：中日外交之二

1871 年秋，中日两国缔结了彼此平等的《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李鸿章曾乐观地认为这一下“束约铁案已定”，日本“断不能转白为黑”。他万万没有想到，双方签约墨迹未干，日本就要求修改条约，紧接着开始了一系列侵华、

侵朝活动。

中日《修好条约》签订不久，日本政府就在 1872 年 3 月派柳原前光出使中国，要求修改条约。柳原于 5 月初到达天津，要向李鸿章递交日本外务卿照会。李鸿章对此大出意外，大为不满，开始拒不相见，继而决定面加驳斥。在上朝廷的《辩驳日使改约折》中，他说对柳原“面加指驳”，坚持两国条约刚刚签订，“断不能遽然悔改”，“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日本“不应蹈此不

魁”。由于李鸿章态度强硬、力拒所求，坚持两国必须办理使条约生效的最后换约手续，柳原只得无功而返。

由于中方态度强硬，日本便于 1873 年 2 月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换约。当然，日本并不甘心于此，副岛来华的另一使命是想一探中国虚实。因为 1871 年底发生了琉球船民遇飓风飘到台湾而被当地居民劫杀 54 人的事件，日本借此开始悄悄作“征台”准备。就在副岛来华换约期间，又发生了 4

名日本人遭风漂流到台湾，后转经上海被送回日本的事件。因此，副岛此行尤其“关注”台湾问题，想进一步探明如果日本侵台中国政府的底线。

1873年4月30日，中日《修好条约》的换约仪式在天津举行，李鸿章与副岛分别代表两国交换该条约批准书。第二天副岛再专程拜访李鸿章，他狡猾地强调日本与中国一样，深受西方各国强加片面领事裁判权之苦，深得李的好感。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述副岛商论外

交》一函中写道，副岛说日本现已派员到西方谈判修改条约，“欲令各国驻日本之洋人悉遵日本法令约束”，表示“中国、日本与西国换约之初，多因勉强成交，又不深悉欧洲习俗，致受诒骗。约已换定，无可如何。每见领事官作威作福，心实不甘”。李鸿章深为此言所动，表示积极支持，并望一旦日本与西方各国改约成功，“定属其随时照录新约”知会中国，以便中国也仿效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副岛这种“同病相怜”的交谈策略，使双方

“畅谈半晌”，李鸿章对其完全丧失警惕。在中国看来，可谓一切顺利，中日“修好”更有保证。5月7日，副岛一行以祝贺同治皇帝大婚及亲政之名来到北京，实际要与总理衙门接触，纠缠台湾问题。在与总理衙门有关大臣的会见中，日方提出琉球船民被杀事件，要向台湾东部“土番”兴师问罪。对此要求，总理衙门大臣当即反驳：强调“琉球本系我朝之藩属”，“当时琉球人有自生蕃处逃出者，我朝命官曾予救恤，后转往福建，经我总督仁

爱倍加，俱已送还其本国”。表示

“本大臣只闻悉生蕃曾掠害琉球国民，并不知此事与贵国人有何相干？”日方则争辩说琉球人即日本人之后，便话锋一转，十分狡猾地问道：“今谓贵国官吏对琉民曾加救恤，请问对狂暴虐杀琉民之生蕃又曾做何处置？”总理衙门大臣根本未意识到此问背后的玄机，信口回答说：“该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蕃，已设府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蕃，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生蕃之

横暴未能制服，乃我政教未逮所致。”日方立即抓住此话，提出“贵大臣既谓生蕃之地为贵国政教不及之区”，证明杀害琉球民人“为化外孤立之蕃夷，则只能由我独立国加以处理”。对台野心，昭然若揭。

总理衙门将上述情况通报给了李鸿章，开始引起李的警觉，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台湾生蕃一案，大觉离奇。日人力小谋大，尤为切近之患。中土不亟谋富强，俶扰正无已时耳！”但是，李鸿章此时仍然

小看日本实力。在给总理衙门的《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信中写道，恰在此时有“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前来拜访，由于吴曾在福建沿海带船多年，曾因美国商人被台湾土著杀害一事与美国领事一同赴台查办，故对情况颇为了解。据他说吴有“蕃人矫捷强狠，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最后只能“仍讲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等语，李鸿章认为“所言似属有理”。在另一封给同

僚的信中，他的轻日心态暴露无遗。他认为日本“所以矫强之由，不过该国近来拾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语洋书，能借国债，能制洋银数事耳。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大夫皆耽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被彼一眼觑破，遂肆意轻侮，口无择言”。但如果日本动兵挑衅，中国“又何畏此小国。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可以

看出，一方面他对日本变法自强佩服不已，对中国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又恨又急，但另一方面仍有传统“上国心态”、仍将日本视为小国。尤其是认为日本“尚无如朝鲜”，足见其对日本实力之小觑、对“敌情”了解、掌握之浅陋。

但日本国小野心确实不小，于1874年4月设立了“台湾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局都督”，并在长崎设立侵台基地。5月初，三千余日军开始侵台，从台湾南部登陆入侵。对日本侵略

行径，清政府闻讯大为震惊，急忙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要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查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稍后又任命他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给他以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亲自与日本打交道多年的李鸿章更是又气又急，在给沈葆楨的信中愤怒地写道：“日本自九年(即同治九年，1870 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

恂恂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人迥异。”“唯彼既兴师登岸，其办法亦不外喻以情理，示以兵威二语。”由于日本声称台湾岛并非全归中国所有，东部所谓“蕃地”乃是“无主地”，因此李鸿章提出包括所谓“生蕃”住地在内的台湾全境均属中国领土，主张通过“喻以情理”和“示以兵威”这两手策略逼迫日本撤军。同时他主动调拨 6500 名淮军精兵乘轮船赶赴台湾以壮声势，并从天津、上海各机器局紧急派调军火枪炮增援。

由于沈葆楨部署得当和台湾高山族居民的英勇反抗，再加此时日本军力、国力确实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感到自己现在还无法用武力夺取全台，于是又开始倚重与中国的外交谈判。1874年7月中，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天津，开始与李鸿章会谈。见到柳原，李鸿章怒不可遏，在给总理衙门的《述柳原辩难》及所附《与东使柳原前光、郑永宁问答节略》函中详述了会谈情景：“鸿章系原议和约之人，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

不得不嬉笑怒骂，厉声诘责。”斥责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一和好”。说到气愤之处，李鸿章“取案上纸笔大书曰：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对李鸿章的斥责，柳原开始还“强辞夺理，至无理可说时一味躲闪支吾”，但一直强调中国政府不惩办杀人的“生蕃”，所以台湾“蕃地”不属中国管辖。对此，

李鸿章反驳说：“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蕃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并正颜厉色说道：“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然后又“喻以情理”地说日本几百年来从未与中国订立修好条约，但“并无一兵入中国边界，今甫立和

约而兵临我境，你对不起我中国，且令我对不起我皇上百姓。若有约各国皆如是，天下岂不大乱了。”

日本由于现在不可能以武力侵占台湾，于是定下从中国取得赔偿，然后将已攻占的地方归还中国的方针，并于8月初任命大久保为全权办理大臣出使中国。在与日方的交涉中，李鸿章多次给朝廷呈上有关奏折，给总理衙门的有关信函更多，于8月底给总理衙门写了此《论台事归宿》函。此函不长，却是李对处理台湾问题的总纲。他终于认识

到“台湾从此多事”，对日本的幻想最终破灭。他提出由于中日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应请各国“会同论理”，“公评曲直以复台疆”，但被日方拒绝。他认为要保全台湾的最终办法是开口通商，将台湾开为商埠，使各国利益均沾，因为“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日方要中国赔兵款换台湾的策略其实也合李鸿章就此了结的本意，只是李认为赔兵款太损中国政府的颜面，提出不以赔款而以“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

艰苦，乞恩犒赏”之名换取日本撤军。这样“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此诚“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之论矣。这倒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大特色。

李的这一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和朝廷的赞同，于是中日双方于 1874 年 10 月底达成协议。其中第一款即说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因此“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所以中国首先“向日本国从前被害

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军队于12月20日全部撤走，届时中国将为日本原先在此修道建房等支付四十万两。

这次日军侵台虽未成功，但中国承认其为“保民义举”且赔银了结也作出了屈辱性妥协，再次表明清政府的软弱无力。这次日军侵台的隆隆炮声，打破了自1860年以来所谓“中外和好”相对平静的局面，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危机。几个月后，李鸿章在呈朝廷的《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中，认识到日本“其

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闥，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

无情的事实，终于使李鸿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的梦想破灭。日本侵台其实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未意识到处境之危，依然故我，又浪费了几十年的

宝贵时光。

琉球之变：中日外交之三

1879 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来华游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交涉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还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与此毫无关系的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

历史上的琉球国位于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由三十几个小岛组成，其王城为中部的“首里”，即今天日本的冲绳县。在中国的明朝，琉球国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明朝覆亡后，清王朝在问鼎中原不久即派人前往琉球，册封尚质为中山王，同时规定琉球每两年进贡一次。此后，所有王位继承人都由清王朝赐给镀金的银印，册封前只能称“世子”，册封后才能称王。最后一个琉球国王尚泰，就是在 1866 年接受清朝册封的。琉球不

仅向清王朝称臣纳贡，而且使用清朝的年号，并常派官生到中国的国子监读书。不过，由于琉球离日本萨摩藩很近，多次遭萨摩藩侵略，在 17 世纪初萨摩藩甚至曾将当时的琉球国王掳往鹿儿岛。此后历代国王慑于萨摩藩的威胁，也向日本进贡，逐渐形成了中、日两属的复杂局面。清康熙朝以后，日本还在琉球设官、征租税、保护商旅等，但他们当时毕竟害怕中国，所以每逢清使来临，这些日本官员便事先躲起来。1871 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

府废藩置县，立即开始了野心勃勃的侵占琉球、将其变成日本领土的活动。

1871 年 11 月，发生了台湾原住民误杀琉球人事件，日本天皇于 1872 年 10 月中旬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日本藩王，列为华族，其目的是为侵略中国台湾寻找借口。日本由于此时羽翼未丰，所以 1874 年侵占台湾的目的并未达到，但却得到了清政府的几十万两白银作为从台湾撤兵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双方签订的《北京专条》承认“台湾生番

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因此承认日本此次侵台是“保民义举”，这就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口实。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建议日本应采取断然措施尽快结束琉球的两属状态，要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1875年5月，日本政府命令尚泰晋京，停止向清朝遣使进贡并不得再接受清朝册封。在日本的压力下，琉球国被迫同意使用明治年号、执行日本法律、改革藩制、派遣留日学生等要求。但尚泰本人不

愿前往东京，而且命令前往东京的官员恳求日本不要强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结果却遭到日本大臣的痛斥。尚泰不甘心就此亡国，决定向清政府求援，于 1876 年底派使臣乘坐一只小船出海，假装遇风漂泊，于 1877 年 4 月到达福州，投递国王密咨，要求到北京陈情。但他们只强调了日本的“阻贡”，而改年号等事却未告诉中国。

得到消息后，清政府认为琉球并非战略要地，不值得过于重视，但如果毫不过问，又恐怕其他国家

认为自己不能保护藩属国，引起连锁反应。由于清政府对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应有的认识，所以在 1877 年 6 月底轻率发谕，要琉球使臣全部回国，不必来京。同时要驻日公使何如璋“相机妥筹办理”，弄清日本阻贡的原因。何如璋于 12 月到达日本，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但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毫无妥协余地。何如璋此时对日本的野心已洞若观火，主张中国不能坐视，要积极干预琉球问题，阻止日本侵略，甚至不惜动武。他坚定地表示在与日本交涉

中如果自己的某一句话被日本作为挑衅的理由，那就请朝廷罢斥自己。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地方官则不主张如此强硬，李鸿章的态度一开始则颇为暧昧，他在给何如璋的信中一方面谴责日本“无理已极”，认为琉球确实值得同情，日本阻贡之举不能不争，并指示何在与日本谈判时可援引《修好条约》第一、二两款相争，并请总理衙门将数百年琉球朝贡的成案抄备，作为力争根据；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琉球地势阻隔，中国干预的困难很大，

因此主张“淡漠相遭”，实际表现出消极冷淡、不主张动武的态度。总理衙门认为何如璋积极干预甚至不惜动武的主张“过于张皇，非不动声色法”，认为还是“以据理诘问为正办”。总理衙门在其观点得到李鸿章赞同后立即上奏，得到首肯，清政府确立了以外交斗争为限、决不动武的方针。

在与日本的一系列谈判中，何如璋态度坚定，毫不退缩，而日本仍坚持一定要吞并琉球，谈判事实上陷入僵局。1879年3月8日，日

本政府决定废琉球藩，并派大批军警到琉球强制执行；4月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6月将琉球国王和王室其他成员移送东京。由于有只能限于外交的指令，何如璋在无奈之中认为不妨请一些西方国家出面调停，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认为美国最有可能帮助调停。这时，正好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于5月末到达中国而后再到日本，于是奕訢和李鸿章都请他从中调停。而格兰特更关心的是中国华工赴美问题，当时美国国内强烈要求禁止华工赴美，希望

修改原先有关条约。清政府此时有求于他，不得不同意“略予通融”。格兰特的活动为后来中美修改有关条约，铺平道路。

格兰特于 7 月 4 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日方声称琉球原系日本属国，同时攻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说何行文外务省时言辞有辱日本之意，如果中方愿将此文撤销，日本同意商议有关问题。7 月 14 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

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一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强。在日期间，格兰特曾同伊藤博文、西乡从道等日本高级官员会谈，但一谈及琉球问题，他们就沉默不语，勉强表示要回去商量。眼见调解无望，格兰特就在8月1日分别致信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竟说：“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球事系

其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宽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足见其本心不愿与中国失和。”反复强调中日“两国应该彼此互让，不致失和，似不必再请他国出为调处”，表明不愿调停之意。在琉球问题上一筹莫展、原将一线希望寄托在格兰特调停之上的李鸿章得此信后焦急万分，在这封给格兰特的回信中首先对格兰特的调停表示感谢，然后重申几百年来琉球即是中国藩属的历史事实，痛斥日本事后捏造证据的无耻行径。信中客气地承认格

兰特这位“贵前主”要中日互让不致失和“诚为公平正大之论”，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强调“日本错谬在先，毫无退让中国之意。中国于前年台湾之役，业经忍让过分，举国臣民已形不服。今此事若再退让，于国家体制声名恐有妨碍”。他几近哀求地请格兰特继续调停：“未知贵前主与其太政大臣等如何妥商办法，使两国面子上均下得去。本大臣窃愿倾听下风，以待贵前主之指挥也。”大清王朝权倾一时、出将入相的中堂大人，不得不如此低

三下四，既令人同情，亦令人可鄙。莫非此正应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老话？同时，他还请格兰特回国后，美国驻日大使仍继续调停此事，与中国驻日公使在东京“接续商办，务使两国归于和睦，感盼尤殷”。对他而言，美国调停可能是唯一的希望。同时他表示：“至敝国朝廷上下，皆欲认真整顿诸务，设法自强，以副贵前主暨杨副将殷勤属望之怀。”

9月2日，格兰特一行离开日本，琉球“调停”毫无进展。但他在给

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信中却把责任推给何如璋，认为何如璋的第一次照会使日本人大为不满，是事情无法解决的关键，他认为撤销照会、撤换何如璋是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但杨约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却不同意此点，他写道：“我看何之为人，实在谦和之至。”他认为何如璋的照会确实过于直率、有失礼之处，但他对李鸿章说：“至于何公使照会一节，此系细故，球事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究。”他认为“照会”其实只

是日本侵略的一个借口，他进一步分析日本必将好战，原因在于日本的改革使有二百万人的武士阶层失去特权，生活穷困，惟愿日本与其他国家打仗自己才有出路。杨约翰能从日本国内阶层变动分析日本将走上战争之路，在当时确属洞见。杨约翰不久还在美国一家报纸上撰文，“乃全指日本为不是”，日本官员对此忿忿不平；欧美许多国家的报纸转载此文，都认为日本对华过于傲慢。何如璋的助手黄遵宪曾写道，日本原来指责何如璋初次照

会失于无礼，但“自杨约翰新闻一出，反谓其行文无礼，乃缄口不复道此，盖中间人补救之力亦不鲜也”。

不过，杨约翰的看法毕竟只是他的个人看法，不是格兰特、也不是美国官方的看法，对日本更是毫无影响。而日本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提出了越来越过分的要求，清政府开始倾向对日妥协、同意其要求。因为日本狡猾地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这时候，正是中俄“伊犁交涉”越来越紧张的时期。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俄国就占领了中国的伊犁地区；从 70 年代中后期起，清政府开始了收复伊犁的努力。从 1880 年初开始，中俄矛盾更加尖锐，俄国开始集结军队，特别是增强太平洋舰队；中国也开始在绵长的中俄边境部署防御部队。在 1880 年的大半年内，普遍认为中俄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级官员的主要关注点，不能不是以伊犁为焦点的中俄关系，而不可能是以琉球为焦点的中日关系。中国朝野普

遍担心“倭为俄用”、害怕日俄结盟，甚至一向比较强硬的张之洞也主张同日本“连和”，“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之”，尽量使日本在中俄冲突中保持中立。此时栖居海外的名士王韬也写文章，认为中国不值得为琉球开战；倘真要打仗，也应等到中国强大到能冒此风险；虽然日本不讲诚信而且对中国的威胁不会消除，但尚不能与俄国的威胁相比；由于俄国已威胁到日本和英国的利益，所以中国甚至可能与它们结成三国反俄同盟。在这

种背景下，中国准备基本接受日本的要求。但 1881 年 2 月底，中俄谈判取得进展，签订《伊犁条约》，清政府争回一定主权，中俄关系有所缓解。3 月初，清廷发谕，正式否决了总理衙门与日本达成的妥协方案，日本驻华公使气愤地离华回国，表示强烈不满。以后的几年中，中日两国又多次因此交涉，并无结果，但日本实际巩固了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了了之地最终被日本吞并。清政府此时确实也无

暇顾及琉球了，因为这时相继发生的法国侵略越南问题和导致日本干涉的朝鲜内乱问题，确实要比琉球问题重要得多。

琉球终于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祭品；而琉球是中国传统的“属国”，中国此时却根本无法保护它免于被强邻吞并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宗藩体系”崩塌的一个最刺目的标志性事件。

朝鲜之变：中日外交之四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在“宗藩体系”中很早就是中国的藩属；

又隔一道窄窄的海峡与日本相对，自然又成为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觊觎的对象。

除奉中国为“上国”外，朝鲜一直实行“锁国”政策，日本人只能在釜山经商。日本首先想与朝鲜建立邦交，插进立足点，但被朝鲜拒绝，于是转而实行“日清交涉先行”方针。于 1871 年 9 月与中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这个条约和章程的精神是平等互利的，但中日对等的关系使此时的日本基本达到目的，因为它

的谋划中，“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使它对中国的“属邦”朝鲜的打压、威逼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谈判中，李鸿章对日本侵朝野心有所警觉，所以《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主要是指朝鲜。在随后几年与日本人交往中，李鸿章也曾多次提醒日本对朝鲜不要怀有非分之想。

但一纸条约和善意规劝根本束缚不住日本的野心。1875 年 2 月，日本派使臣前往朝鲜，由于国书中有“大日本”、“皇上”、“敕”等字样，而且日本使臣乘坐轮船、身着西洋大礼服，引起朝鲜方面反感，拒收国书，谈判陷入僵局。5 月，日本军舰“云扬”号擅自测量朝鲜海岸，意在示威。9 月 20 日，“云扬”号再次擅自驶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朝鲜守军开炮警告，日舰即开火将朝鲜炮台炸毁。12 月，在日本的压力下，朝鲜政府通知日

本代表国书可以接受，但要求把“皇上”、“敕”字样改掉。几乎同时，日本政府派森有礼为驻华公使，同清政府谈判朝鲜问题，同时遣使率舰队驶赴朝鲜处理江华岛事件。1876年初，森有礼同总理衙门反复交涉，强说清朝与朝鲜政府之间的宗藩关系只是一种“空名”，所以日朝之间的关系与《中日修好条约》无关。此时总理衙门倾向于认同这种观点，认为朝鲜“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

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但李鸿章却不赞成这种观点，所以1月24日在保定直隶总督府与森有礼激烈舌战七个小时之久。森有礼明确说：

“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同时强辩朝鲜不是中国属国，李鸿章则针锋相对指出“持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强调朝鲜“奉正朔”怎能说不是中国属国？最后森有礼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详细报告了与森有礼激辩的情况，同时

建议奏请礼部要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以息事宁人。在李鸿章的坚持下，总理衙门在 1 月 29 日照会森有礼，重申清王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要求日本严格遵守《中日修好条约》中“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的规定。当然，森有礼对此置若罔闻，因为日本的目的是一定要打开朝鲜大门。但在日本的压力和清政府息事宁人态度影响下，朝鲜于 2 月底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共 12 款，而第一款一开头就写道：“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

权。”若仅从“文本”、且以今日之国际关系准则来看，朝鲜是与日本平等的“自主之邦”何错之有？岂非“天经地义”？但在这种冠冕堂皇的“文本”之后，其实却包藏着日本的“祸心”。这一条的真实意义是为了割断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为将来侵略、吞并朝鲜扫清障碍。这一条款再次提醒人们，对任何宣言、纲领、条款等等，都不要轻信字面上的意义，而要透过“文本”，看到文本之后的实际目的、作用和结果。《江华条约》还规定除釜山

外，还要对日本人开放两个港口。通过这个条约，日本还取得了通商口岸的租地造屋、自由测量海岸、派驻领事、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清政府却愚蠢(也可能是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朝鲜仍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此点与否无关紧要，因此既未向日本抗议，也未行使“宗主”之权向属国朝鲜诘问。

《江华条约》是朝鲜被迫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它的大门终于被日本打开。此后，日本借口朝鲜是“自主之邦”，“顺理成章”

地开始越过中国直接与朝鲜交涉，并竭力将中国排除在外。说实话，此时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才刚刚起步，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将“征韩论”付诸实施，其侵略朝鲜的野心比西方列强萌发得更早、更强烈，除了地理上与朝鲜相近以外，还有与俄国相争、要抢在俄国前面的缘故。俄国与朝鲜本不接壤，但 1860 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的 40 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这样俄、朝之间才有土地接壤。俄国南下侵朝的野心日益明

显，西方其他列强也企图前来瓜分。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俄国都加紧了在朝鲜的活动，而日本吞并琉球更引起了中国的警觉。1879年6月初，在家养病的前福建巡抚丁日昌条陈海防事宜时，认为日本有吞并朝鲜之心，但西方列强侵略各国主要是为了通商等种种利益，而“无灭绝人国之例”，所以主张朝鲜终不能闭关自守，不如主动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如果遇到日本、俄国吞并朝鲜，中国应“全力卫之，并可邀齐与高丽有约之国鸣鼓而攻，

庶几高丽不致蹈琉球覆辙”。经过总理衙门的讨论和建议，朝廷肯定了丁日昌的意见，但觉得“不便以此明示朝鲜”，因为如果正式通知朝鲜与各国立约通商毕竟有碍中国是“天朝上国”的面子，所以在 8 月 21 日命令李鸿章查照丁日昌条陈，作为个人意见给朝鲜使臣李裕元通信，“私劝”朝鲜主动与西方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上谕还以李鸿章曾与李裕元通信、且现在“大局所关，亦当权衡轻重”为由，解除李鸿章“必不肯轻与藩服使臣往来通问”

的担心。

劝朝鲜与各国立约通商、门户开放，李鸿章早就有此想法，所以在此折中称赞丁日昌条陈“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在以前给李裕元的复信中，他其实就透露过此意。李裕元是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辅，尚得主持大政”，影响很大。在 1875 年曾作为“属国”使臣来华，归国时曾致信李鸿章表示敬意，李鸿章向朝廷解释说自己当时“以古者邻国相交，其卿大夫不废赠答之礼”，故曾回信。

有了朝廷的谕旨，李鸿章在给李裕元的长信中畅谈了他对朝鲜处境、东亚形势的看法和应该奉行的外交方针。他认为日本居心叵测，行为乖谬，恃强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应及早设法防范。朝鲜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应作外交努力，“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简言之，他--实际是整个清王朝--只能向过去的“藩属”推介“以夷制夷”这种炮艇外交横行时弱者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上朝廷此折中，李鸿章对在国际大势上几乎一无所知的朝鲜能否采用此策不无怀疑。同时认为朝鲜尚未开放，担心如果采用此策与外国立约时“利病素未深究”，中国不能不代为参酌；由于朝鲜不熟悉“洋情”，突然与洋人相处可能会发生种种冲突，“应由中国随时随事妥为调处”。后来的事实说明李鸿章的这种担心确有道理，但朝鲜最终被日本吞并，则说明“以夷制夷”并非“普适”的良方。

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

一、穷则变，变则通

1864 年，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有三千余字。这封信是近代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重要文献，是洋务思潮最初的表现，自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

曾国藩、李鸿章最初看到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他们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1861 年湘军攻陷

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訢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或许是曾氏与洋人交往有限，或许是他对洋人抱有戒心，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

而李鸿章 1863 年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其中两所由中国人主持，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前两个炮局没有雇佣外国工匠而且也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

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起初也无机器设备，但不久就购置了一些机器，这些机器虽然非常简单，但毕竟是中国政府首次引进机器，意义不可低估。这三所“洋炮局”，不仅为淮军镇压太平军提供了不少炸炮和炮弹，补从西方购买武器之不足，而且为今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訢赞赏，在奕訢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资，购

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此信虽长，看似松散，却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知识引进的观念变化。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

炸炮、炸弹和蒸汽机作了详细介绍，其绘声绘色、浅显直观，犹如一个对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学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讲解。现在想来，这些曾是最严肃认真的官方文牘，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经地认真阅读这些文字，确使人忍俊不禁。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相对稍稍开明的王公大臣，开始“睁眼看世界”时懵懂初开的幼稚，亦可看出他们想了解“奇技”奥秘的迫切心情，而这与当时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仍将“奇技”视为“淫巧”形成

鲜明对照。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当有更深的目的。

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虽然浅白，却是中国官员对“西学”的知识谱系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标志。而且，他开始把中西之“学”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标志。因此他的这番论述确实格外重要，其实这也是他此信最重要的目的。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殫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西方的武器之所以强大精确，“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他强调“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

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器之学在西方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而制器之学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从不能列为“正宗”，所以其“创制之员匠”地位低下，“曲艺”同流。这种比较，颇有

“知识社会学”的意味，在当时实属难得。他不得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但目的是为了强调“独火器万不能及”；而强调“火器万不能及”的目的是为了指出中西不同的另一原因，即中国传统“理”与“事”分离：

“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能对“儒者”有某种非议，当时至为不易。相反，西学则不仅能“造”而且求“通”，“通”即“理”也。也就是说，其实西方更符合中国传

统理想的“理事相通”，所以“制器”才能发达。“制器”，并非中国传统鄙视的“形下之器”，而是有深刻的“道理”蕴寓其中。

其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不

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读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倍感遗憾，近代中国的历史被李鸿章的后一种预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国“无以自强”，迅速强大的日本岂止是“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而是成为中国最疯狂的侵略者。不过，几年

后当他初掌全国“外交权”时，却一度忘记此言，居然主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当然，这是后话。这说明，此时他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是为了激励国人。

他痛心国人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拒不变改，语重心长地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也就是说，当形势从容足可以变革时，人们总不相信危机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机来

临时，人们才相信应当变革，只是这时往往已没有时间了。纵观晚清历史，清廷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变革图存机会的。

最后，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

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李鸿章提出“觅制器之器”直接进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阶段，将大大缩短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历史过程。“觅制器之器”自然要有“制器之人”，而中国传统考“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度根本培养不出“制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把自然科学知识“专设一科”以培养“制器之人”，确属洞见，但当时却是惊世

骇俗之论，恭亲王奕訢在呈皇上的奏折中对此也只字不提。然而四十余年后，科举终被完全废除，不知在白白浪费四十年时光后，人们是否想起李鸿章的这番建议。

但对李鸿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营兵弁到江苏学习炸炮的建议，恭亲王却赞赏有加，并奏准实行。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缘旗人居有定所，较易防闲，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而慈禧当即下谕说：

“该弁兵等到苏后，该抚务须加意稽察，妥为防闲，俾秘妙之传不至稍有漏泄，方为妥善。”清政府对民间深抱警惧的心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二、从求强到求富

自领兵沪上粗通洋务后，李鸿章就一直尝试办厂造枪造炮。经过一番“小打小闹”后，1865年他终于筹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对近代中国工业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

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他曾这样说道：“各国洋人不但辘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由于当时风气未开，李知道用大机器生产遇到的阻力过大，担心总理衙门有独木难支之虑，故致书威望较高的御史陈廷经，阐

明中国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世界大势。他感叹自己略知国家富强的“底蕴”，故“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天下事终不可为矣。吾丈知爱素深，究心机要，附陈一一，伏希心鉴”。陈为信中的说理透彻和情真意切所动，于1865年1月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

御外侮”。朝廷将此折发下，要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

李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对于开办方案，李鸿章也有具体的考虑。以往的经验使他认为，如果委托洋商从国外购买机器不仅价高而且难于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国机器厂学习，他也认为“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也难以判断。由于上海已有一些外国人开办的机器厂，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以适当价格就地收购一家，因此嘱咐下属丁日昌着手经办此事。

1865 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准备出售，而且该厂能够修理制造轮船枪炮，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丁以银六万两买下该厂及其所存储的全部原材料，合并原来建立的两个洋炮局后，终于奏准成立。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

酌办理。”这样一来，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显然，陈廷经早先在他力劝下给朝廷的那则奏疏犹如一枚早已布下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如此重要、具体的作用，不能不让人深叹李鸿章的老谋深算。紧接着他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他称将此厂由旗记铁厂改名为

“江南制造总局”系“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覬觐”。不过若深究一下，他起此名可能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明明是座兵工厂，它的英文名称即“Kiangnan Arsenal”（江南兵工厂），但他却不像此前办的“洋炮局”、“军械所”那样，名正言顺地给工厂冠以军工之名，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洋务”迟早要突破“求强”的“军工”范围，进入“求富”的“民用”领域，这种认识极为超前。他明确写到军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

侮之资，自强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在此，他预言了一个社

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当时连恭亲王和曾、左、李等实权人物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创办这类官营军工企业都如此阻力重重，连他们此刻尚且无权创办生产民品以求富的企业，根本无法想象民间可以用大机器生产日用品谋利。而李鸿章却认识到大机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而且民间必然要用机器生产以“自求利益”且官方无法阻拦这一历史趋势，确实识见深远。他之所以能有此认识，因为他认为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

以省人物之劳费”，“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中的道理应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而“天下至奇至异之事，究必于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则推之必不能远，行之亦不能久”。

最后，他再次借陈廷经折提出自己的洋务思想：“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

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均超过“外洋之俗”，只有机器技艺不如西方。而“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国文化是“全体”应该为“本”，西方技艺是“偏端”应该为“末”，所以学习机器制造并不会伤害中国之本，不必担心“中学”之“本”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是洋务派对反对学习西方机器技艺的顽固派的回答和反驳。

另外，此折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之事，他仍是

在应付朝廷。曾经在 1865 年 5 月，京城受到捻军严重威胁，清廷要李帮助天津设厂但为李找理由拒绝。但随着捻军的发展，清廷在津建厂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接连发出几道上谕一再索要李鸿章在上海、苏州等地办厂的部分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要李鸿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对此要求，李鸿章还是拖延敷衍，实际决心机器与人员均不外放。在此折中，他仅承诺将“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同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

但接着他又声明：“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仍是行拖延之计。不过随着职位的变化，后来他对“津局”的态度又大有变化。当然，这是后话。

三、后发国家的困境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中国“向西方学习”也是从仿造轮船枪炮开始的。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在 1865 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于 1868 开始建

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到 1870 年,该厂又建造了“操江”、“测海”、“威靖”等轮。

紧接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 1866 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但左宗棠立即被调任陕甘总督,于是请沈葆楨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在沈的经管下,闽厂发展迅速。1869 年 6 月,该厂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终于下水。到 1871 年底,该厂又陆续

建造了“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等船。

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 1872 年 1 月 23 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

耗”。如果“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殫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

督抚阅看，酌情议奏。这道“上谕”行文也颇为巧妙，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但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的文煜则表示支持。这使清廷依然举棋不定，便于 1872 年 4 月初再发上谕，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三人通盘筹划、悉心筹议。

左宗棠、沈葆楨于 5 月初先后

覆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 6 月下旬才覆奏，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在这次上奏中，他首先高屋建瓴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之后膛枪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

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

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论的由来。因此“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坦言我们并非不知道开始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但现在必须开办此事，否则今后将后悔不及。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

反对者指责福建船厂在筹划开办时曾上奏花费不大，现在花费远远超过当初计划，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颇有“钓鱼工程”之嫌。对此，李鸿章辩解说负责创办福建船厂的两个法国人并非造船专家，估算可能不准；并进一步详细说明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确有相当说服力。

对于反对者即便中国建造兵船，与外国在水上打起仗来也未见得能

赢的论点，李鸿章的反驳看起来相当低调，他不能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但实际却非常有力。他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但他以结束不久的普法战争为例，说法国兵船无论质、量都胜过普鲁士，最终还是战败，所以“兵事胜败，固难言已”。接着不厌其详地介绍了英、法更为先进的军舰，其装备设施非中国新造轮船可以相比，他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中国想打胜仗也要造这样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更多经费。他巧妙地利用了论敌的

矛盾：我们新造军舰打不过列强是因为没有它们的先进，如果你要求我们能打赢，就应拨更多的造舰经费、而不能裁撤刚刚起步的造舰事业。他接着便反驳说：“今欲我数年创始之船，遽敌彼百数年精益求精之船，不待智者而知其不逮。然就已成者而益求精，未必其终不逮也。”何况，中国现在建造轮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只是为了防守沿海、沿江，这些地方由于水浅礁多，“外洋大兵船、铁甲船势难深入”，

所以从保卫海防而言，现在所造船舰规模、水平完全够用。退而言之，即便我们的兵船打不过外国，但我们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反之，如果因我们建了这些船也打不过外国而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接着他以相当篇幅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

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赢利赚钱。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如果我们一直像现在这样不能自己用机器生产铁、煤而不得不依赖进口，那么一旦中外冲突，“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

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这才是真正应该忧虑的。

其实，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确实，能否用机器生产枪炮兵船明显关系到清王朝的生死存亡还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用机器生产煤、铁，组建近代航运业等与“军工”无关的事业确更难推行。此时，李鸿章认为时机已到，便借反对者提出财政问题而提出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最

后，他总结说：“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为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

清廷将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这场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结束。而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

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从“求强”到“求富”，不但是洋务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而李鸿章此折中“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

四、在洋商与华商之间

在半年前，李鸿章即指出创办民用轮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现在的情况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

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当奏折被批准后，他就开始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准备，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二十三日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日给总理衙门致函，将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创办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局面。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

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中国的航运业务事实上被它们垄断。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不过，由于中国素来的“抑

商”传统，再加上朝野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政府禁止商人办新式企业，所以中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一些巨商甚至投入巨额资金。这样的后果是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因此，李鸿章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局的主张。

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这封信中指明当前的形势是：“中国长江外海

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企业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

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

“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

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临国内的重重阻力

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当然，这是后话。

李鸿章与晚清第一批留学幼童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洋务派在国内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又开始创办出国留学事业。办新式教育都阻力重重，派学生出洋的困难更不难想象，所以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一些重要奏折、函件，均由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联名，足见其对此事的重视，亦可见此事的阻力之大，非曾、李联名而难成。

曾、李或许早就有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念头，但将此事提上议程、付诸实施，则是接受了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译员容闳的建议。容闳是广东人，早年受美国传教士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对外国的深入了解，使他认为中国要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派学生出洋留学。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就不断为此努力，但四处碰壁，均以失败告终。但对此并不灰心，一直全力奋斗。1868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字雨生)向朝廷

上了一个派遣留学生的条陈，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870 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奉命前赴处理，容闳担任曾的译员。容闳充分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参与办案的丁日昌向曾提出派人出洋留学的具体计划，并表示自己愿意带队前往。他的建议切实可行，终获曾国藩同意，即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旨准。1870 年冬，朝廷正式旨准曾、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建议。

由于这类事属总理衙门管理，所以曾、李一直与总理衙门充分沟

通，1871年6月26日他们又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论述了派人出洋留学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行性。他们认为留学可以“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这也符合“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对中国已办有新式学堂，故不必费资巨大派人留学的反对意见，他们反驳说“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兴之基也”，而“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中国不可能尽购外国兵船机器，只能派人出去

学习，同时还以百闻不如一见，
“欲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于庄岳之间”等中国古训加强自己的论点。
他们认为派人留学所费虽巨，但有二十年时间，所以每年负担并不算重，“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他们特别提出，1868 年中美两国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早就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为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当然，这些学生在国

外还要配备中国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同时，他们将具体制定的 12 条章程作为附件送上，征求意见。除经费问题外，这 12 条的主要内容大都是关于留学生的选派、管理和使用。规定每年选派 30 名十二三岁的幼童赴美，分 4 年共派 120 名；学生所学专业要由清政府决定，留学期限为 15 年，毕业后要回国听候政府派用，不得在外入籍他国，不得在外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规定在外留学仍要学习中国儒学传

统经典，并定期由正、副监督传集学童宣讲《圣谕广训》等，若发现有品行不端或身体不适者将随时送回国内。

而后曾、李又几次上奏，再三强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并提出具体措施。在人们想方设法出国留学或让子女出国留学的今天，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派遣留学生之困难，所遇阻力之大。那时在国内上“洋务学堂”都被视为有辱祖宗门楣之事，要到“番邦”去拜“洋鬼子”为师，更是被认为“背宗叛祖”，

所以愿意、敢于出国留学的人很少。为了完成留学任务，只得在穷人一向有出洋传统的东南沿海地方作为任务“摊派”。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地方官甚至挨家串户做劝说工作。本来“官派”就是出国所有费用全由政府负担，但愿意去者仍然不多，地方官不得不再许给这些穷苦人家更多好处。有些贫苦人家原本出于生计已经报名同意，但又听说西方的野蛮人会把他们儿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于是立即反悔，取消报名。

结果，只有 30 个名额的首批留学任务竟然没有完成。首倡留学并且具体负责此事的容闳焦虑不已，只得回到老家广东香山县说服动员，同时又在香港的新式学堂招收学生留学。首批留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有家人、亲戚出洋闯荡的经历。后来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其父也是非常勉强地送他出国的。詹家虽不富裕，但非赤贫，所以詹天佑之父詹兴洪自然也要他走科举功名的“正途”，根本没想要他留学。詹家有位谭姓邻居长期在香港做事，对西方情况

有所了解，他非常喜欢年幼聪颖的詹天佑，便力劝詹家送詹天佑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在谭的反复劝说下，并且谭还同意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詹兴洪才勉强同意詹天佑出国留学。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李鸿章首创留学事业的艰难。

1872年2月，曾、李奏准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经过一番运作，第一批幼童终于在1872年8月踏上了出洋留学之途，

掀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晚清的政府与企业关系

由于清廷一直禁止私人创办近代新式企业，所以李鸿章在 1872 年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就是“官督商办”，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

就是“戴红帽子”。

由于招商局的成功，清政府主要是李鸿章又创办了“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这种企业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

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长期没有定论。轮船招商局是创办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所以围绕着它的争论自然最早、也最激烈。

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

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

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李鸿章的“官督商办”设想，客观上适应了华商的需要。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地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更加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

不得已，李鸿章于 1873 年 3 月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同时，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任命为会办。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在他们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始迅速发展。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大增，招募商股进展顺利。他们按照商业模式、规则办事，规定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

总和商董主持，使投资人对局务有一定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创办之初，招商局一方面面临洋商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

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 10 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 4 艘发展到 30 余艘，总装载量近 24000 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 1877 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 16 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

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重港口增设了分局。

有关数据表明，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 1873 年到 1876 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 4923000 两，这期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 136000 两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

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虽然招商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本来，顽固派注重的就不是经济，而是所谓的名分，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不要看经济效益，而要看政治效果”，宁要符合自己思想意识、政治标准的草，不要不符合这些标准的苗。于是，有人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参劾招商局的奏

本便一直不断，此奏一出，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纷纷要求收归官办，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立即上折坚决反驳。在此折中，他首先说明招商局是依照几年前所定章程经营管理的，当然，这也有提醒朝廷别忘了这些章程当初是经过你批准之意。他强调开始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与官无涉、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

官任之，这些见解远超出当时其他官员，显然，他认为“官督商办”应以商为主。对于顽固派提出经营者贪污、滥用公款的指责，他辩护说与其他官办局开支公款完全不同，只是在开办初期由“官”借了一些公款：“惟因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何况这些官款早已归还，与官更无关系。对于查账的要求，他知道这并非官无权查账的纯商办企业，而是官有权查账的“官

督”企业，所以不能以官无权查账反驳之，只能晓以“利害”劝说不必查账。他解释说如果查账会使谣言更多，现在是与洋商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洋商一定乘机打压招商局，再度垄断长江航运，结果“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总之“商局关系国课最重”，不能轻动。

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不久，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

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在 1881 年 3 月中旬又上折反驳王先谦时，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有趣的是，李鸿章在此折中用

得利的是“中华”而不用“华商”，说明他深知朝廷对“华商”等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戒，所以刻意回避“华商”这种容易联想到私人的词汇。在激烈争论中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儿，当然更容易赢得朝廷的支持，而且华商得利确也可说是“中华”得利。一词之选，煞费苦心，反映了李鸿章写奏折的老练。然后，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暮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

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垄断之计。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约论”，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不会将此作为一个决策的参考因素，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

理由。所以，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如果开始垫有官款，则“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这类企业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干预太多，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

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在 1885 年以前，轮船招商局发展迅速，但以后就陷入停滞状态，直到李鸿章去世都没有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官”的色彩越来越浓。

1883 年迫在眉睫的中法战争在上海发生一场巨大金融危机，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招商局也不例外。这时，一直存在的要求其收归官办的呼声陡然强烈。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于 1885

年重组招商局，札委官员盛宣怀为督办。盛是官员出身，在任督办期间一直保有官职，因此“官”“商”两面性在他身上反映最为鲜明。与商人相比，他显得“官气十足”，习惯“官场作风”；与官员相比，他又更像商人，后来还不足维护商人利益之举。

在他主事期间，招商局“官督”大为加强，“商办”大为削弱。在挑选高层管理人员时，他按“官场”规则，挑选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而不是以“商场”规则按股份

多少或任人唯贤。这样，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都有深深的官方背景，但却缺乏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另外，招商局开始被官方视为“摇钱树”，户部不断要求“核查”（实为要钱）招商局账目，同时明确要求招商局总办应由高官会商遴派。从1891年后，谙熟官场规则的盛宣怀还不得不每年向官方“报效”10万两。

招商局已然成为一个“衙门”，既丧失了自主经营权，又不断被官方索财，终只能惨淡经营。在70年

代末，它的船只数目和吨位远远超过英商怡和、太古公司，但到 1894 年它落到与怡和不相上下、远远不如太古的境地。

虽然如此，招商局仍是清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总有人想将其“收归国有”，所以十几年后，即甲午战后的 1896 年，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散置，大权尽失。这时，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虽未明说，实

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验”，反驳了王鹏的建议，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创办于 1880 年的“电报总局”也面临同样命运。架设电线、成立相关机构对近代以来一直军情紧急的清政府本是重中之重，但与所有新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因顽固派认为这些是西方的奇技淫巧不能学而迟迟未有进展。李鸿章于 1879 年在自己的辖区内试架短短一

线，后又于第二年藉沙俄准备侵略新疆伊犁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上奏请敷设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批准架线设局。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官办电报局经营未久，便面临经费严重紧张问题。在李鸿章的支持、筹划下，电报总局于1882年春改为官督商办。改制后的电报总局，完全是商股商办。

或许因为轮船招商局创办在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成立稍后的

电报总局命运则相对平稳，在 1902 年前未遇将其“收归国有”之议。

1902 年秋，李鸿章病逝未及一年，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开始设法要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收归国有。袁以强硬著称，主张“强政府”，由政府兴办新式企业，所以想把“北洋”的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增强政府、同时也增强自己的实力。此时，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的经营者盛宣怀父亲病故，袁世凯乘盛丁忧守制之机，夺去了盛宣怀的“督办”之职。

刚开始，清中央政府想派人将轮、电二局收归“央企”，以利中央财政，对此盛宣怀坚决反对，错误地想争取“实力派”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当然也反对将此二局收归中央，但他的真实想法是一定要将其收归“北洋”，即“地方国企”。

盛宣怀是个复杂异常的人。他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精明超常，本身即是官员，对官、商两界都非常熟悉，深谙为官之道与经商门路。李鸿章乃至后来张之洞创办企业，

都对他十分倚重。虽然他于 1885 年担任招商局督办、与前任相比他主政时的“官督”大为加强，官的色彩较浓；但与那些要完全官办的人相比，他又是“商”的代表，坚决反对“官办”。早在 1894 年 2 月初，他奉李鸿章之命接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担心企业办好后为官收回，向李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以前的企业都是“局”，“局”乃官方机构名称，“厂”则

是企业名称。由“局”改“厂”，一字之易，却是大有讲究。李鸿章同意盛的方案，将其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1901年，由于棉花价格猛涨，工厂亏本，盛宣怀串通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称由于亏损严重，“自应准其另招新商顶替，改换厂名，再接再厉”。经清政府批准后，盛宣怀以原价买下自己股权占优、一手经营的企业，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机器纺织总厂--集成纺织公司，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

商办”经过逐步改制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否“化公为私”或曰“侵吞国有资产”，一直争议不断。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正说明了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制度灰色地带”，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今天许多“戴红帽子”企业其实也是如此改制，盛氏百余年前的手法依然适用，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早就担心这些“官督商办”

企业可能被收归国有，盛宣怀在经营轮、电两局时就多次想方设法将盈利及各项收入转为商股，以便万一将来政府按票面价值将轮、电二局购归国有时，包括他在内的股东利益不至损失太大。

然而，此时“商人思维”的盛宣怀面对的却是“强政府思维”的袁世凯，他根本无意按股票票面价值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1903年1月中旬，袁世凯被清廷派为电务大臣接收电报局。袁世凯以政府资金紧张、无法全付商股为由，表

示商人仍可“附股一半”，而另一半商股则以大幅度杀价“购回”。此法一出，商情哗然，但毫无办法。但此时清政府因要支付巨额“庚子赔款”连超低价的“价购”都付不起，在降旨袁世凯接收之时宣布：

“该局改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对这种完全的“商股官办”朝廷还说是在维护既有体制之中“寓体恤商情之意”。无论盛宣怀及众商人多么不满，想出种种办法，都无法改变收归官办的命运。袁世凯的基本思

路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官。

接收完电报总局，袁世凯紧接着就强迫盛宣怀辞去招商局督办之职，派自己的亲信杨士琦担任该局总理。这样，袁世凯通过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轮船招商局由他派人督办，从而将这两个大型企业实际收归己有。

以前有李鸿章作靠山，盛宣怀做事一直顺风顺水，现在靠山已去、且面对的是“强势政府”袁世凯，自然毫无招架之力，顿时败下阵来。他当然不甘就此作罢，于是暗中准

备，窥伺时机，以图夺回企业。他本来就是亦官亦商，现在对“官”权之大的体会更深，于是在积极联络股东的同时又向大太监李莲英巨购买官，终于在 1908 年 3 月授邮传部右侍郎。铁路、电报、航运和邮政都归邮传部管，盛氏顿时权力大增。有了权后，他首先联络电报总局的入股商人与政府交涉，要求退还收归官办的电报总局的商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最终按每股 180 元的价格将全部股票从股商手中买回，股商挽回部分损失。

就在这年 11 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政坛风云突变，袁世凯骤然失势，被贬归家，盛宣怀明白机会来临，于是开始努力夺回招商局。在被袁世凯收归官办的短短几年中，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不仅未添几艘船只、未增加一处码头、栈房，反而不得不将上海浦东、天津塘沽、南京下关的码头卖掉。盛宣怀以挽救招商局为理由于 1909 年 8 月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会上“组织商办隶部章程”，“注册立案”，并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会议上报后，

邮传部(盛宣怀任右侍郎)覆电承认轮船招商局“本系完全商股”，同意其设立董事会。招商局终于完全商办。

在招商局、电报总局的争斗中，中央(清廷)、地方(袁世凯)和商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产权不明”混沌状态下，自然是谁的力量大，权益就归谁所得。在这种时而“国有”、时而“民营”的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影响最大、失误最严重的是清政府的铁路政策。

铁路最开始引入时受阻力最大，

但铁路的巨大利益终于显示出来，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因此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

修路耗资巨大，财政极为紧张的清政府根本无此力量，所以又不得不招商股，而更多靠举借外债。1905 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 1904 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部公司也于 1907 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

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 1908 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

官控，遭到这几省民众反对，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强烈反对下，清廷于 1909 年末和 1910 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清政府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于 1911 年 5 月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张下悍然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几年之内，于国计民生大有干系的铁路政策竟如此反反复复，清政府真是“自寻短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允许民众大量入股，现在突然宣布“国有”，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怒不可遏，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或者说让股民满意)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

“两湖”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低价”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最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当年极力维持商民利益的盛宣怀一旦就任邮传部尚书，观念即随地位的变化而变，成为“铁路国有”的主要策划者。因铁

路属邮传部管，一旦铁路“国有”，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实际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强行此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

“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外资确实挤压中资，但外资却又是“中资”产生的温床，华商在自己的政府不许自己已经办近代企业的情况下，正是在外资企业开始了初步的资本积累，学习到近

代企业管理经验。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成败的关键之处在于“官方色彩”是渐渐淡化还是不断强化，“官”方对企业是支持、扶持还是将其作为一个下属“衙门”对待，这就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经验。

由于“民”远弱于“官”，所以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

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极不

稳定经常大幅度摇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常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幻莫测，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政策立

即转向“国有”。

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会安居乐业，社会没有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从前的人如何看待铁路？--晚清的铁路大争论一

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国

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最长也最激烈。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

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这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訢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先造清江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奕訢向

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訢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鸿章便不再直接谈此问题，转而不断策动他人提修路建议。

1876 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要他上疏建言，因台湾远离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

能血脉畅通，才可以防外安内，不然列强总会对台湾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请，但此事却因经费短绌而中止。转眼几年过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紧张，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运兵成为重要问题。在这军情紧急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就防务问题提供对策。到京后，刘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

刘折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局势的演变和刘折的说理充分，清廷似为所动，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鸿章、刘坤一就此发表意见。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折，约四千言，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对修建铁路的最大阻力是“道

义”、“传统”、“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自卫”或“意识形态证明”，论证现在修建铁路与中国古代圣人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本质一样，目的都是以济不通、以利天下。如果现在不用火车，就如同早已用舟车的“中古”又放弃舟车回到茹毛饮血的荒蛮时代，必然要落后于人。针对顽固派一贯坚持的理论，即认为机器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强调机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

风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机器能使人的心智由“拙”而“巧”、“朴”而“精”，既是一种“知识论”，但同时也含有肯定进步观念的价值观，他以此反驳机器使人心败坏的“道德论”，确有说服力。

然后，他再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铁路的“九利”，在这“九利”中，经济与军事是富

国强兵最重要的。对这“九利”，他不吝文字，详细陈说，以期打动朝廷。具体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其实，刘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他当然明白，朝廷必然会担心修路经费和主权问题，所以直陈由于所需资金庞大，无论是官还是商，都难以凑集，只能向洋人借债。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订明一切招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且还规定不许洋人

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款。他不仅提出了由名望甚高的淮军将领刘铭传主持修路，甚至提出可用淮军“勇丁帮同修筑”，可谓中国“铁道兵”的首倡者呢。

由于创修铁路于国计民生确实至关重要，且是李鸿章的多年心愿，所以一折书后他感到言犹未尽，同时又附上《议覆张家骥争止铁路片》，对张家骥等反对者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反驳。张等认为，修铁路会使市镇繁华、民众富裕，因此会

更加刺激列强侵略的野心。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们如果能自强、百姓富裕，“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相反，如果“我不能自强”、百姓贫穷，则国势更弱，将更受外人轻蔑、更易为外人欺凌。李鸿章顺势进一步论述了民富与国强的关系：“盖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如果像张家骥等人那样因担心列强侵略“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其实未必能阻止列强的侵略；他甚至退

一步说，即便这种百姓贫穷之法真能杜绝别人的侵略野心，“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对反对者提出的铁路将“有碍民间车马及往来行人，恐至拥挤磕碰，徒滋骚扰”的观点，他则不厌其详地描述了国人当时闻所未闻的铁路与普通道路交叉时的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旱桥”，即今天的“立交桥”之法，另一是“于两边设立栅门瞭望，火车将至则闭栅以止行人，俟火车既过，然后启之之法”。最后他情绪颇为激动地写道：“士大夫

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还鼓励朝廷说：

“臣于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

虑。”

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如有人上奏指责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把修筑铁路说成是“为外国谋”，将改革者说成是汉奸、卖国贼，而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凭借一套具有“道德优势”，但实际虚假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话语打压革新者，是近代以来顽固派

的惯用伎俩。实际上，正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真正误国害国的，其实正是这些顽固派。

还有反对者奏称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蠹民”的“邪说”。对铁路，还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看它是什么“性质”，这种传统，其实非常深厚呢！还有人上

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

洋务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刘坤一以圆滑著称，知道反对修铁路者力量强大，所以上奏时态度模棱两可，认为修与不修各有利弊，最后要求清廷飭令刘铭传再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作决定。

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未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中国近代化再次受挫，但李鸿章此折，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化思潮的重要文献之一。

近代铁路海军造

1880 年底，关于是否能修铁路的大争论以洋务派失败而告终。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而且，他明白修铁路虽然不可能作为一项“国策”，但有可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作为一项“地方”的“土政策”施行。

就在争论最激烈的 1880 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以便运煤；1881 年这条约 10 公里的短短一段铁

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譞早已取代恭亲王奕訢，最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鸿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给奕譞写信，说明兴办铁路的种种好处，奕譞有所心动，所以李才敢将唐胥路修完。但李一直认为修路应是举国兴办，所以在

给奕譞的信中说修铁路在中国“阻于浮议”一直未能兴办，并且明确表示希望由奕譞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譞、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 1886 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

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同年，奕譞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订修路办法。奕譞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但以奕譞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商议时，也

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更加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更易办成。据此，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便以要运

煤以方便商业为理由，将唐胥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 10 公里延长到约 40 多公里，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 25 万两。就在 1886 年底，李鸿章又与奕譞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1887 年春，由奕譞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 130 公里左

右。可以看到，从 1880 年修唐胥路到 1888 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时，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唐山天津的线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说：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

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于 1888 年 11 月通过奕譞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

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而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譞，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还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

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入侵即可经由铁路直达京师。二，修路扰民。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怨沸腾。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铁路修通后，将导致成千上万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了他们的生计。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

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

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1880 年底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辩时，双方基本只能空论修路的利弊，无法以经验、事实来检验，再加上顽固派比洋务派强大得多，以洋务派失败告终。而这一次大争论，则有已经修成的唐津铁路以事实证明铁路的优越性；更加中法战争后奕譞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所以坚决支持修路，这样赞成与反对双方力量旗鼓相当。面对这种局面，朝廷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认为

各位“廷臣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而各省将军督抚向身处各重要地方，亲自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所以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发布“懿旨”，要地方大员也发表意见。但这些“地方官”都谙熟官场的“游戏规则”，知道赞成与反对两派在朝廷各有势力，不能轻易得罪，结果明确表态支持与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含糊其辞、态度暧昧。这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

支持修铁路。不过，他的建议却是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干路，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遂告结束。

从是否修铁路来说，这次争论以洋务派胜利告终，所以奕譞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然而，李鸿章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一方面，若从 1872 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他提出改“土车

为铁路”的主张起，到现在已近二十年，虽然十分艰难、耽误了二十年宝贵时光，但朝廷最终同意修路，他当然为此高兴；但另一方面，张之洞的建议明显是为限制自己的北洋系势力进一步扩张，而朝廷决定也明显扬张抑己，所以又有深受打压之感，时有怨愤。而洋务派内部也有不少人对于李鸿章北洋系扩张过快大为不满，如威望甚高的曾国荃上奏坚决主张要修铁路，认为今天不修明天肯定也要修，各国皆同，但对修津通线一事却三缄其口，决

不附和。

不过，李并不甘心自己的计划落空、势力受损。他知道，要修长达三千华里的卢汉路谈何容易，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所以他在给其兄的信中不满地说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泻底”。因此，他对修卢汉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张之洞不愧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也是官场高手，岂能让李鸿章作壁上观？想方设法也要让李鸿章“上马”为我所用，所以向朝廷建

议卢汉路分几段修筑，先修南北两段；南段从汉口到信阳，由他负责；北段从卢沟桥到正定府，由李鸿章负责。他还提出以十年为期，前几年先建铁厂、钢厂，后几年再开始修建铁路，“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对此主张，李鸿章大不以为然，曾以此中前辈教导后辈的口吻致电张之洞说，从开采铁矿、炼钢到做成铁轨、机车实非易事。如日本一直在大修铁路，工、料虽然都用土产，但直到现在钢轨仍不得不从西洋进口。最后，他表示“自愧

年衰力薄，不获目睹其成耳”！一是以此推脱，二是表示自己看不到那一天对张大泼冷水。就在他辞就两难之际，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龙兴之地”我国东北的安全，他于 1890 年 3 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因此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李鸿章大喜过望，再不以“年衰力薄”推却，并迅速派人

前往测量勘路。以当时形势而言，确应先修关东铁路，而李鸿章也确实善于“把握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

关东铁路实行官办，将原来修卢汉路的每年 200 万两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因为唐津铁路已修至滦州的林西镇，李鸿章决定关东铁路由林西造干路出山海关至沈阳，再到吉林，再从沈阳造到牛庄、营口的支线。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醇亲王于 1891 年元月病逝，李鸿章此时在山海关设立了北洋官铁路局，生怕

此事因而生变，所以在此函中格外提醒新任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譞等人：“追思醇贤亲王临终之恨，未睹斯事之成”，大家都是这一提议的发起人，更加“责无旁贷”。他表白自己之所以敢于不畏劳苦、甘冒舆论反对担此重责，一因“欲报醇贤亲王之知遇”之恩，另外也是“自尽当官之职事也”。

当一切按计划进行，林西至山海关段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路于 1894 年春建成通车后，户部决定挪用关东铁路经费给慈禧太后作六十寿辰

庆典之用，不得不停建。而奕譞的去世使李鸿章在朝中失去强有力奥援，只能遵从停建之命。

“铁路”这种新式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你争我夺……不啻是一幅当日官场的“缩图”。

跪拜礼仪之争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世界观的彻底崩塌。这种崩塌不仅是国家主权、领土等受到侵犯，而且与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声名文物、礼仪规范等等开始动摇。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朝野都难以接受。而最不能忍受的是最高的礼仪、华夏文化最高的礼仪性象征--觐见皇帝的礼仪居

然受到了“褻渎”。那些属于化外“生番”的“洋鬼子”作为“贡使”到位居“世界之中”的“朝廷”拜见皇帝即“真龙天子”时，竟然提出拒不跪拜，而只行鞠躬之礼。

“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在洋人的船坚炮利面前，“朝廷”亦无可奈何，不能强迫他们跪拜中国皇帝，然而又不能容忍有几千年传统的最高礼仪被破坏，于是陷入难解的两难之中。

今人可能已经很难理解这一切了，因此，且容我慢慢道来。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自居，对“礼”自然格外注重。在所有的礼仪中，最为庄严、神圣、隆重、严格与不可“冒犯”的，当属觐见皇上之礼。大概中国的皇帝们早就“不教自明”如今才流行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礼仪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资本”，是“权威”的象征或来源，维护、加强“礼仪”就是维护、加强“权力”，所以要不顾一切地维护“成礼”，有时甚至重“名”远甚于重“实”。由于“中国”位于“天下”之“中”的“天

朝上国”，所以华夏之外统统是“不文”的野蛮世界。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而且，又以中国作为远近的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名称的翻译往往还要加“豸”（以示尚未成“人”）或“口”（以示可“吃”，类同动物）旁。无论“生番”“熟番”，都要靠中国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礼乐规范来“教化”。

但就在乾嘉盛世，来自化外英

吉利的“番臣”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却偏不肯行觐见皇帝的跪拜之礼，不仅明拒“教化”，自甘堕落，且生出一段又一段难了的“是非”。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有七百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这位大英帝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

关系。

马氏一行辗转来到北京后，没想到却因觐见皇上之礼与清廷争论不休，最终没有达到目的。

正处盛世的大清王朝，上上下下没有一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与意义，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使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负责接待他们的钦差大臣徵瑞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充满赞许之情：“英咭利国远在重洋，

经数万里之程，历十一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马氏一行自然得到中国官员的热情款待，不过使他们极为不快的是，他们的船队却被插上了“英咭利的贡使”的长幡；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上，“礼物”被改为“贡物”。马氏在递给中方的有关文书中译本以“钦差”自称，中方当然不能容忍，为此，乾隆皇帝谕旨曰：“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既然是“贡使”来

“进贡”，觐见皇帝时当然要按“天朝”体制向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马氏提出只有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对英王也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所以坚决不同意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礼。由于中方一再坚持，马氏提出或者按“平等对待”原则，如果要他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之礼，中国官员也应向英国女王像行此礼，否则他只以向英王所行之仅屈一膝的吻手礼向乾隆行礼。此为中国官员严拒。从7月下旬到9月中旬这近两个

月的时间中，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最终，还是中方妥协，同意英使不行双膝触地的跪拜之礼、而只屈一膝的要求。或许，这是因为在清廷眼中，英咭利尚属完全不通礼仪的“生番”，不能强求，有待“天朝”将其慢慢化为“熟番”。这样，在9月中旬谒见皇上，“万邦来朝”同庆大清乾隆皇帝八十三岁大寿的庆典中，只有这几名不堪教化的“生番”拒不行双膝触地的跪拜礼，而行单腿屈膝礼，犹如鹤立鸡群。不

过，当时就有人不愿正视此点，刻意编出英国使臣稍后觐见乾隆帝时“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的神话。不过此时正值盛世，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无人料到此事其实是几十年后中国文化要遇到一个更强的文化的巨大挑战、产生严重危机的先声和预兆。

虽然“天朝”宽大为怀，免去这几个“生番”的跪拜之礼，但对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并谕告英王：“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

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特遣使恭赓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所谓“天朝体制”，是指凡西洋各国只有愿意来“天朝”“当差”者才准其长期居京，既然在“天朝”当差，实际就是“天朝”的臣民，因此要“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

本国”。乾隆确实无法理解马氏提出的在各国首都互派外交使节，不能不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对通商要求，乾隆皇帝则认为毫无必要，因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氏一行在受了一番羞辱之后，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有阿美士德率团来华，中方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不想双

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大清官员反复要他演练觐见皇上之礼，均被婉拒，最后称病，不见中国皇帝。嘉庆皇帝得知详情自然大怒：

“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便传旨遣其回国。

若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出发，乾嘉之际这两次英国使臣来华要求通商、互派使节，本为中国稍敞大门，与外部世界广泛接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历史机遇却被丧失。这种“礼

仪”之争背后却潜藏着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冲突。英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己的文化建立在现代科学与经济制度之上，因此最先进，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代表；中方则认为自己永居万古不变的宇宙秩序中心，处于“万邦来朝”的地位，自己的文化最完美，由此派生的礼仪是文明基础，理所当然负有将“生番”教化成“熟番”的责任。在这种语境中，二者的“对话”实际便无法翻译、沟通，一次历史机遇就此擦肩而过。

最终，“世界最强”的国家终于按捺不住，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同中国“对话”，迫使“礼仪之邦”一点点屈服于西方的“语言”，中国终于在血与火中被强行纳入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而痛苦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政府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激烈抗议道：“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表现出少有的坚

决。视“礼仪”重于“地”与“款”，后人可能难以理解。不过几经谈判之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这使“天朝体制”被打开一个不小的缺口，觐见皇帝之礼便迟早要发生变化。咸丰帝严拒接见西方使节后，不久就病故，由其年仅五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帝)即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之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对中国来说根本性的“礼仪”问题

再也无法回避。这一次，各国使节采取公使团联衔照会总理衙门的方法，提出同治皇帝亲政之时，如果他们不代表本国亲见皇帝、递交国书，就是失职。而且，按国际惯例，一国使臣进入某国后，如该国元首不予接见并接受国书，显系不友好的表示。对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由于事关重大，在这四个月之中，各路官员纷纷发表意见，提出

自己的看法。不少官员坚决表示绝不能允许不行跪拜之礼，但他们又知理由不足，所以提出“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即“中国出使之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外国驻华使节“在中国则行中国之礼”。由于外国不行跪礼所以中国“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国国君、元首行跪礼，而外国使节在中国必须向中国皇帝行跪礼。

对此，洋务重臣李鸿章也奉命发表意见。其实，早在 1868 年中英修约之前，他与左宗棠、曾国藩等

就对此发表过意见，都认为不必也不可能以中国礼法苛求，甚至提出西方诸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中国属国，现在自不可能向中国行属国的跪拜之礼。现在，李鸿章自然明白中国早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地位，传统的礼节不可能不改。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反对改变者将其上到事关国体、“乾纲”的地位，而且被改者不是别人，正是皇帝本人。因此，在此李鸿章首先不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肯定”自己坚决反对的昧于时势、坚持要洋人行

跪拜之礼的其他大臣，“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其潜在意思是，无论什么观点，无论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论”，都是耿耿忠心为朝廷考虑。接下来他仍不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肯定从咸丰九年到现在十好几年间，一直具体经办此事的总理衙门“每以中国礼节相绳，几于唇焦舌敝”，已尽了最大努力，不是亲办此事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甘苦。

然后，他以历史为据，指出嘉

咸丰二十一年时英国使臣来华已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盖其国势渐强，而衅端已伏矣”。在崇拜“祖宗”的中国，指出这一点至为重要。行文至此，李鸿章并未明言自己的观点，但其观点又已明确表达。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已与侵略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也表明这些国家与中国“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明确说出这些国家与中国实际已是“敌体平行”而非中国属国，要朝廷放弃“天朝上国”观念，至

为不易。因此，“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

对许多人主张的“中国使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各国使臣在中国，当行中国之礼”的主张，他认为根本行不通。因为“洋人素性狡黠，贪得便宜，岂不知跪拜之输于不跪拜耶”而且，“中国亦无权力能变其各国之例”。这样，只能接受他们“以敬其国君之礼敬我皇上”这一事实。对此，他提出“取其敬有余而恕其礼不足”，作为一

种自我心理安慰。他进一步提醒甚至恐吓说，如果拘泥于礼仪而拒不接见外国使节，虽然眼下不至于“遂开兵衅”，但现在“中外交涉事件繁多，为日甚长，洋人好体面而多疑猜”，结果会“积疑生衅，积愧生忿，将来稍有齟齬，必先引为口实”。“倘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后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而且，这也并非“圣主包容六合驾驭群雄之志量也”！在对“圣主”的赞扬中，使之难以反对。

他进一步提醒朝廷，这种“礼仪”迟早要改，已是历史的趋势，如果“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历史潮流，确难抗拒。

当然，为表明自己实在是为皇上着想，并非完全任外国予取予求，他说自己已与有关大臣定好规矩：

“各国使臣来京，只准一见，不准再见；只准各使同见一次，不准一国单班求见。”对那种怕外国使臣当面顶撞皇上的担心，李解释说递交国书只是礼节性见面，使臣“善言称颂，君亦善言慰答”，不会发

生外国使臣“面质廷争，毫无顾忌”之事。

由于事关根本原则，所以李鸿章还必须从中国儒学经典中寻找根据。他以孔子的“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来为自己的论点辩护。

“嘉善而矜不能”就是说对别人的优点要承认欣赏，对别人的不足要同情宽容，所以在“礼制”上洋人有缺点不足，我们要宽容才能“柔远”。现在中国在这方面迁就洋人，并非丢脸之事，而是孟子所说的

“以大事小”的“乐天”表现，也就是朱子所说的“仁人之心”。总之，“礼制”的这一重大变化完全符合圣贤教导。凡事必须符合“本本”，符合圣贤经典，确是中国深厚的传统。

他看出朝廷还有一层担心，即废除洋人觐见皇帝跪拜礼节很有可能导致中国臣民对“跪拜”的怀疑，进而导致对皇权的怀疑。所以在这篇原本是“对外”的奏折中特又指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

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也就是说中国的“礼法”只能用于“内”而不能强行于“外”，他再次说明内外有别，“洋人”并非中国属国。他强调“礼”要随“时”而变，“我朝向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现在十几个国家在京城和通商口岸驻有使节，“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不但列祖列宗无此定制，即载籍以来，昔圣昔贤亦未预订此礼经。一切交接仪文，无可援据。应如何斟酌时势，

权宜变通，是在议礼制度之天子，非臣等所敢妄拟也”。这里，他明确提出“列祖列宗”和古时“圣贤”都未对现在“大变局”时代的礼仪制度作出规定，所以根据时代变化权宜通变、议定礼法等事应由现在的“天子”决断。可以根据时代变化修改或自定礼法，确是大胆议论。朝廷对此的另一担心是改变体制恐被后世责备，对此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倘蒙皇上俯念各国习俗素殊，宽其小节，示以大度，而朝廷体制自在，天下后世，当亦无敢议其非

者。”虽不行跪拜之礼“朝廷体制自在”，“天下后世”也无人敢非议。

最后，他表白说自己与洋人打交道已逾十年，“于洋人要挟毫无情理之事，从不敢附和依违，致乖大体”，并特别提出几年前中英修约时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各有覆奏，“皆请格外优容”。搬出曾、左两位重臣，使自己的观点更有分量、更易为朝廷采纳。

觐见皇上的礼仪可说是最高的“原则”问题，但李鸿章此折通篇

没有也不可能从抽象的“原则”来论述此问题，而是从历史、经典和现实情况这几个方面详细论述不得不改革变通的道理，极具说服力。

一直负责此事的总理衙门亦力主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终于，朝廷在 1873 年 6 月 14 日降谕“著准”各国使臣觐见。6 月 29 日，一些国家驻华公使以五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紫光阁觐见了清同治皇帝。

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方向上，又迈出艰难的一大步。

一桩晚清官场丑闻

这是一个荒唐年代演绎出的一个荒唐离奇的故事。但“荒唐离奇”背后的政治脉络却并不离奇，彰显出晚清朝廷的“政治生态”，彰显出政治与工程之间的复杂关系。

圆明园是著名的皇家园林，自雍正帝以后，园居渐成宫廷风尚，尤其咸丰帝更是常年在此，几乎以此为宫。因为住在集中西园林之萃、景色宜人的圆明园，要比住在宏伟壮观、气象森严，每日必须“正襟

危坐”的紫禁城自在、舒服得多。无奈圆明园被英法侵略军焚毁时，正值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清廷统治岌岌可危，当然顾不得重修这座废园。但几年之后，太平天国和捻军刚被镇压下去，便渐起修园之声，引起清廷内部的激烈争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座花园的修与否，最终却引发了晚清政坛的一场轩然大波。

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861 秋，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后，慈禧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

“辛酉政变”，推翻顾命制度，确立太后垂帘亲王辅政体制。奕訢由于在政变中厥功至伟，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权柄赫赫，炙手可热。由于奕訢总揽朝中大权，不久便与权势欲极强的慈禧产生矛盾，明争暗斗，终于势同水火。1865年春，经过精心筹划之后，慈禧突然下诏痛责奕訢，明令“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此诏一出，却引起不少王公大臣、地方大员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尚未掌

握全权的慈禧于是召见奕訢，当面训诫后就发谕旨说：“本日恭亲王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惻然……”所以决定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议政王”。经此羞辱打击，奕訢的权势与威望受到重创。

奕訢当然不愿就此罢休，一直寻机报复。1868年9月，深受慈禧宠信，一贯恣意妄为、不可一世的大太监安德海知道奢华成性的慈禧一直想修复圆明园，于是指使御使

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讨好慈禧。由于修园需款甚巨，安德海同时又指使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此议一出，奕訢等人坚决反对，认为“侈端将启”，加饷派饷更会使“民怨沸腾”，“动摇邦本”，“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在奕訢的坚持下，德泰、贵祥二人受到革职和发落黑龙江披甲为奴的严厉处分。但安德海并未因此而稍有收敛，且于 1869 年秋违反祖制以为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

南下，为山东巡抚丁宝桢

执杀。慈禧闻讯大惊，不过碍于祖制，又有慈安太后、同治帝、奕訢及一些王公大臣的联合施压，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但却气急败坏，大病一场。

慈禧病愈之后，内务府人员又以太后休养为名，重提修园之议。内务府人员长期力主修园一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更是为了从中得利。晚清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国家的大型工程项目，更成为有关人员大捞一把的好机会，所以有关方面总

是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目争取兴办各种项目，以中饱私囊。内务府人员这次吸取了前番德泰、贵祥的教训，采取了长期游说、引诱性喜游乐的同治帝的办法，终使同治帝在 1873 年秋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重修圆明园的上谕，并要“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但御使沈淮在上谕发出的第三天就上疏皇上，力请缓修。不想同治大怒，再次下谕修园。这两道修园上谕颁发之后，内务府立即行动起来，赶忙雇佣民工，清理旧园，同时命令南

方一些省份立即采办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期报送北京。慈禧当然更是忙碌起来，多次召见有关人员，甚至审议一些具体方案，多次颁发有关谕令。对此，反对者依然不少，不过“帝师”李鸿藻苦谏同治毫无效果，御使游百川上疏恳请缓修反被革职。同治帝还严告群臣，再有奏请缓修者一定严惩。奕訢开始还声言反对，后见如此阵势，深知此次难以阻止，便三缄其口，反而首先“报效”工银二万两，表示支持。

1874年3月7日，圆明园正式

开工重修。不过，此时修园的时机的确非常不好。法国正加紧侵略越南，作为北犯中国的跳板，直接威胁到中国的西南边疆；日本开始发动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新疆又爆发阿古柏叛乱，左宗棠率军西征日夜为难以保障的庞大军需发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外患内乱不断，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连办紧急军政大事的财力都无法保证，此时却还要大兴土木重修圆明园，根本就拨不出款来。与重新修园所需经费相比，官员个

人的“报效”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正在内务府为修园经费一直无着发愁之时，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声称愿为修园报效三十万元的木材应急。李光昭原为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贩，本有前科，后来“捐输”得来一个知府衔，但并未得部照。所谓“捐输”，就是用钱买官或官衔，可以直接交纳银两，也可以为地方公共事业捐银，按清政府规定的“统一价格”，以捐银的多少“购买”不同等级的官衔。鸦片战争以前，捐输只是用于

特例，如筹措战事银饷、赈灾等等，并曾一度废止。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一直困难，捐输竟变成常例，并日渐成为清政府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李光昭来京贩卖木材时与几位内务府大臣相识，知道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便谎称自己在许多省份都购有木材，可以报效。他与内务府有关人员互相勾结，经内务府出面奏请后，他便打着“奉旨采办”名义南下办理此事，而且胆大妄为地私刻了“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銜”的关防。由于此事办得

极不顺利，他只得到香港向一位法国商人购买，签订了购买三船价值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木材，先付定洋十元货到天津即付款的合同。李光昭回到北京后，却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木材“报效”。货船到天津后，同治帝闻讯大喜，急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免税放行，迅速运京。不想李光昭根本无力付款，便称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法商当然不干，由法国驻天津领事出面，照会天津海关和天津道李光

昭私自废约有意欺诈，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令其付款并赔偿法商损失。李鸿章本就不赞成此时修园，急忙将此情况奏报同治帝。同治帝大怒，责令将李光昭先行革职后交李鸿章严厉查办。李鸿章在查办此案时才发现，李光昭不仅根本无力购买这些木材，而且欺骗朝廷多报了二十多万元的货价；更严重的是，他竟私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外商立约，此案险成外商与“大清皇帝”之间的诉讼，几乎要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

李鸿章查明，合同“原文翻译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与外商立约字样，“诘其何得如此狂悖”，但李光昭却狡辩说中文内无此语，不过中文合同已经丢失。李鸿章又请专人查看洋文合同，证实李光昭“捏造奉旨采办旗号”、擅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签约。根据有关律令，李鸿章判处李光昭斩监候，秋后处决。

强烈反对修园、但不敢公开反对的李鸿章，知道此案是阻止修园的难得机会，所以他在上朝廷的奏

折中，对李光昭诈骗细节的介绍不厌其详，桩桩件件，不容怀疑，皇帝读后能不龙颜大怒？他在历数李光昭的罪状时，同时就写明律书所规定的相应刑罚，提醒皇上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两罪按律应斩监候。如此这般，李鸿章犹恐不足，在奏折最后再将李光昭罪行概数一番：并无家资却借“报效”之名行欺诈之实；本无存木却称是数十年前购留；定价实际只有五万多却虚报白银至三十万两之多；捏造自己的奉旨采办及圆明园监督甚至被洋

商误认为是“李钦使”。“此等险诈之徒，只图奸计得行，不顾国家体统，迹其欺罔朝廷煽惑商民种种罪恶，实为众所共愤。本非寻常例案所能比拟，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然而，他深知李光昭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但此事实关宫廷内部权争，非他这种“外臣”、“汉臣”所能置喙，所以最后一句笔锋突然一转，针对皇上要他“严办”的谕旨说道：

“惟定例并无如何加严明文，向来似此案件，应仍请旨定夺。”最终，

还是要皇上定夺。

李光昭诈骗案的消息迅速传开，輿情大哗，人们拍手称快。因为上上下下反对重修圆明园的人数虽多，但在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威压之下全都敢怒不敢言，李案为他们提供了公开反对修园的良好良机。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与其他一些王公大臣联名上疏，痛陈修园之巨弊，恳请急停。他们担心仅有上疏还不够，又再三要求同治帝召见，面陈利害。经过再三恳求，终得覲见。8月27日，晋见皇帝时奕訢将折中所陈数

条再一一详细讲解，同治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对他们怒斥一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大学士文祥见状伏地痛哭，几乎昏厥，为人扶出。醇亲王奕譞则继续泣谏，痛陈必须停止修园之理由。这些初步打动同治帝，同意考虑停止修园。但最后的决定权实际在慈禧手中，于是李鸿藻又上疏慈禧，详论停止修园的种种理由；一些御史也上折参奏内务府大臣与李光昭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的种种违法事例。在这种情势下，同治帝在9月9日又召见军机大

臣、御前大臣等再议是否修园之事，同治帝与奕訢、奕譞之间竟然反复辩驳。由于群臣都主张停工，同治帝不得不决定发旨停修，事情到此似已结束。

然而就在当天军机大臣拟就停修谕旨之时，内廷忽然发下一道同治帝朱谕，列举恭亲王种种罪状，革去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清代宗室封爵共分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辅国公”为第十等，奕訢的爵位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交宗人府

严议。9月10日又下一道朱谕，将对奕訢的处分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其子革去贝勒郡王衔。同时，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醇王、文祥、李鸿藻等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大臣尽行革职。但就在第二天，即9月11日，慈禧突然在弘德殿慰谕奕訢，表示“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消”。同时懿旨赏还奕訢及其子爵秩。这一“夺”一“还”，其实都是慈禧在幕后操纵，意在再

次向朝廷内外表明奕訢等王公大臣都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已大权在握，她的权威不容轻觑，更不容侵犯。

至此，历时半年的“修园之争”虽以“停修”而结束。但由此引发的政坛风波却进一步加强了慈禧太后的权威，再次严重削弱了恭亲王奕訢的权势。因此，当同治帝在几个月后(1875年1月12日)突然病死，在慈禧深违祖制、采取一系列阴谋手段强立载湉(光绪)为帝以独揽大权的过程中，曾经权倾一时的奕訢

此时却只能听之任之，甚至随声附和，日渐成为晚清政坛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

是否重修圆明园本来是个工程问题，但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中，这种“工程问题”往往会演变成为“政治问题”。一旦最高统治者决定要上某项工程，反对者就有“犯上”之嫌，因为事关最高统治者的颜面和权威。而且，由于政争不能透明、公开，所以各派政治力量经常借机生事，以此大做文章。围绕着“工程问题”的相互斗争往往会

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使政治格局发生某种变化。在这种背景中，“工程”就成为“政治”，所以对一些重大工程是否应当立项便很难作比较科学、客观的评估，立项后的实施操作更充满复杂斗争。这当然是“工程”的不幸，但利用“工程”达到政治目的，却是这种政治体制使然。

第一个驻外大使的惨淡际遇

1876 年，因滇案签定的中英《烟台条约》，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派驻驻外大使，今人看来是最正常、平常的一件事，可能认为与《烟台条约》中赔款、通商等项相比，此条不值一提。然而，当年这可是有“天翻地覆”之感的大事。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这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常礼，但中国从来以“天朝上国”自居，

从无派大使到“属藩”之说。而近代以来却又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一方面感到与“蛮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屈从列强的压力和横蛮要求。这种对“洋人”既鄙视又恐惧的心理与坚持传统“礼仪”、中外从不互派大使的观念紧紧纠结一起，更不愿派驻驻外大使。互派大使，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争论最大、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最为痛心疾首的一条即外国公使

驻京。1858 年中英天津谈判时，中方代表曾表示皇帝宁可一战也绝不让步。但在英国代表与其将来北京挤满了外国军队、不如现在就痛快答应的武力威胁下，咸丰皇帝最终勉强同意此点，批准了《天津条约》。同意外国公使驻京的消息传来，清廷大员一片怒斥，认为撼动国体，“从来外夷臣服中国”，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是“不修臣节”。咸丰皇帝则又强调外国公使驻京是只准暂住，而且“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

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依据一定坚持其公使常驻北京，则他们“必须更易中国衣冠”。同时又要中方谈判代表改订部分条款。英、法侵略者拒绝改订条约之议，决心以武力将其公使“送入”北京。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不得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外国公使“史无前例”地开始常驻北京。但是，以后的十几年中，中国仍一直没有外派驻外大臣。对此，西方列强一直不满，认为这

表明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所以在中英因“马嘉理案”谈判时，英方一直坚持中国要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派高官出使英国，但派谁出去却是清政府的一大难题。因为当时人们不仅将出洋视为畏途，更将离开“礼仪之邦”到“蛮夷之邦”视为一件奇耻大辱，出洋者将名声扫地，很难找到愿意出洋的高官。同时，出使者又必须懂“洋务”，在清政府的高官中懂洋务者实在太少。

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在政坛几起几落的湖南人郭嵩焘(字筠仙)担此重任，因其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 1856 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

的重要一员。1875 年初，辞官在家闲居八年的郭嵩焘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而“马嘉理案”几乎同时发生，最终中国同意向英国派驻公使。

中国对外派驻常驻公使，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当然，是在屈辱中被迫走向世界。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大臣的消息传来，他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

“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

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而李鸿章却对他出洋表示鼓励、支持。为了表示“平衡”，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字云山)担任副使。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 1876 年 12 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

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 1877 年 1 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秩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

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行》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但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却对郭嵩焘的《使西纪行》表

示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 1877 年 5 月 9 日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在 1877 年 7 月 11 日的信中，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但二十年来自己仍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因此更感郭的“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

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为郭甚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李鸿章的支持，对面临巨大压力的郭嵩焘当然是莫大的鼓励。但在驻英大使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

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清政府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于1877年4月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与郭同为公使，使刘气焰更高，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

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认为这都是“汉奸”行为。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刘更是接连上奏朝廷，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诬陷郭嵩焘。对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退意渐浓，

多次上奏要求调回国内。

对郭刘之争，李鸿章当然支持郭嵩焘。1877 年 11 月初，李鸿章致书郭嵩焘，密告朝廷将以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要郭不要称病乞退，同时劝郭千万不要公开与刘决裂，让外人见笑。由于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渐次开展，一时人才奇缺，于 1878 年 2 月底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然而，刘锡鸿等人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 5 月 6 日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洋洋数千言，大到造谣说郭嵩焘总

“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小到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其用心之刻毒、言辞之激烈严峻，超过以往。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1878年6月20日他给总理衙门的信

中，十分巧妙地为郭辩解。由于他与郭的关系、对郭的支持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辩护，而是借到德国了解中国在德学习军事的“武弁”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当然，他先要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刘也经常“托病不出”。他强调“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

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又多猜疑。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但他提醒总理衙门：“惟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而且“英人尚无间言”。德国报界对刘“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尚无间言”形成鲜明对照。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于郭刚从伦敦到巴黎，所以总理衙门应致函慰

问，“以安其意”，等到找到合适人选再准郭离职。相反，刘锡鸿在德国若如“李监督等所云，于大局既无裨益，且与筠仙积怨成衅，咫尺相望而声息不通，徒为外人所窃笑，似属非宜，想高明必有以处之”。虽未明言，但留郭免刘之意却又极为明确。稍后，李鸿章专门致函反郭较力、素与自己作对的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他在信中解释说之所以如此主张，“盖深知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

所窘苦，势难并立”，所以自己才“进此调停之说”，但自己并不知道郭刘互相参奏孰是孰非、朝廷谕旨如何处置、总理衙门又如何调停。由于郭嵩焘“退志既决”，英国报纸也报道说他将因病告退，所以还请总理衙门慎重处理此事，他认为此事重大，总理衙门应与恭亲王奕訢相商再作决定。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

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回后，又专门在7月10日致信总理衙门再“论郭刘二使”，强调“惟英使一席，关系綦重，名位既须相称，才望亦要兼优。筠仙尚为英人所推许，颇难为继”，所以挑选继任者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方面是为总理衙门选人建言，另一方

面也是为郭嵩焘美言，间接反对将其治罪。同时，他在这封信中还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任职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不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在这一纸“公平”对待郭刘二人的命令下，潜藏着两大政治

力量的激烈较量，是经过了一番角力后才达到这种“平衡”。

在处理郭刘矛盾中，反郭力量在总理衙门中占优势，所以原本决定只召回郭嵩焘，而刘锡鸿仍任驻德公使，另派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任驻德使馆参赞。李凤苞曾先后在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福州船政局任职，1876年由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是李鸿章一手培植的亲信。作为洋务派的一员，他自然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与刘锡鸿不和，而到德国了解留学生

情况时则与刘锡鸿齟齬不断。李凤苞听说自己被任命为要在刘锡鸿手下工作的驻德使馆参赞时大不乐意，于是分别给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字春帆)写信，表示不愿从命，请代为婉辞。老于权谋的李鸿章立即意识到此事可用，于是在 1878 年 7 月 18 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此信虽短，但对清政府下令同时撤回刘锡鸿、较量双方“打个平手”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信中提醒总理衙门选派公使、参赞只有“各得其宜”才能“各尽其用”。李凤苞到

德国本是为了监管留学生并兼查在德学习的军官，工作本就繁重，如果与公使关系融洽、配合默契“针芥素投”，则“尚可分身，乐为效命”，但由于刘锡鸿“性情诡变，难与共事”，所以无法就任参赞。李凤苞在给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字春帆)的两封信中详述了刘的种种不是，故李鸿章将两信附上，强调“设身处地，似系实情，碍难相强”。但李凤苞派充参赞本是刘锡鸿奏请，所以李鸿章说自己开始并不知道此事，不便由自己“越俎”

代为奏请撤销，究竟如何为好，请总理衙门“卓裁核办示覆为幸”，以此将了总理衙门一军。原来在德使馆的几个人现在都已离开，而李凤苞又坚决请辞，刘锡鸿“可谓独立无助”，而紧接的一句则十分有力：“其人之德器名望概可知矣”。最后他不无要挟地写道，如果你们要暂留刘锡鸿或又不便撤销李凤苞的任命，“鸿章等势不能强迫李监督驻德，致误学生功课”，万一刘锡鸿以李凤苞不赴参赞任职奏请惩罚，还希望总理衙门“大力保全之，

以彰公道而惜人才”。

这封信的立论是不能强迫李凤苞赴德任参赞，但真正意图是要求总理衙门在撤换郭嵩焘的同时也要撤换刘锡鸿，否则有失公道。几天后，李鸿章又给总理衙门大臣周家楣写信，坚决反对对郭查办治罪，同时再次要求撤换刘锡鸿。他认为对郭嵩焘最多不过是免去他的官职“而不应更加余罪也”，而刘锡鸿“横戾巧诈，日记虽可动听”，但名声实在不好，德国驻华公使回德后对其“益加轻侮，于大局毫无裨

益，亦须妥筹撤换耳”。对李鸿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同时撤刘、反对将郭治罪的意见，清政府不能不认真对待；同时，也不能不认真考虑刘锡鸿是否胜任。而即将接替郭嵩焘赴英上任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也上奏反对将郭治罪，并在临行前慈禧太后召见时当面为郭嵩焘申辩。经过紧张、激烈斗争，终使清廷改变初衷，同意不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并且同时撤回刘锡鸿。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

力交瘁，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

晚清立嗣丑闻

1875 年 1 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便成了问题。按照清代的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出一男性晚辈继承帝位。同治皇帝载淳是“载”字辈，其下是“溥”字辈，按祖制，应从“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帝位。但立“溥”字辈的人继承帝位，慈禧将因其孙辈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位虽尊却不能垂帘听政，所以慈禧不惜违

反众意、破坏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再强调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顾，坚持一定仍要从“载”字辈中选择嗣帝。也就是说，要从同治皇帝的平辈、即诸堂兄弟中再选新皇帝。即便从“载”字辈中挑选，皇室近支中最有资格入选的应是奕訢长子载澂，但慈禧一因奕訢与己不和，如立载澂，恭亲王的权力过大，对自己不利；二因载澂年已十七，如立为帝就要亲政，慈禧同样不便揽权。想来想去，挑来挑去，慈禧最后选中

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皇帝)。因为当时载湉只有四岁，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帘听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在宣布立载湉为帝的会议上，无人敢反对，倒是作为新皇帝之父的醇亲王奕譞当即昏倒在地，甚至难以扶起，究竟是对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这种明目张胆违反祖制的做法心惊胆战真正昏迷，还是故作姿态向众人表示并非己意，已无法考证。但无论哪种可能，都说明违反祖制的严重性。唯一的争议是在选定载湉的诏书上有

人主张应写明载湫过继给已死去十余年的“文宗”咸丰帝为子，有人主张写明为“嗣皇帝”，最后采取了两说并用的折中手法，定为“载湫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由于慈禧使光绪帝载湫为文宗咸丰帝之子，这就使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在宫处于既非皇后也非皇太后的尴尬境地，终因不堪忍受慈禧的折磨和凌辱，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便自杀身亡。由于慈禧早已大权在握，所以她强立载湫为帝并未引起大臣的公开反对，

只有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和御使潘敦俨上奏，非常曲折委婉地表示不满，但前者被慈禧传旨申饬，后者受到“夺职”的处分。慈禧这种“枉国法、干舆论”的做法只遇到一两个并无实权官员的温和的反对，很快为其压下，并未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

然而，四年之后，即光绪五年三月(1879年4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借慈禧给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大葬”之机却在蓟州的一所废庙中服药自尽，以尸谏抗议慈禧的行为。

他在遗疏中公开指责慈禧强立载湉为帝是“一误再误”，力辩大清二百余年来“以子传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错误做法而改变；同时要求将自己葬在蓟州。

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甘肃皋兰人。1835 年考中举人，由举人官伏羌(今甘肃甘谷)训导，主讲朱圉书院近十五年。道光三十年(1850)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十年职未动。1861 年，丁母忧，归讲兰山书院。1865 年春再入都，补原官。1872 年补河南道监察御史，

这年冬弹劾滥杀无辜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结果因朝中有心保成而吴复疏争辩“语过戆直”，反被降三级调用。1874年返里重讲兰山书院。1876年起用为吏部主事。

此次吴可读以死犯谏和遗疏的言辞激烈，使朝野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明白，吴可读以死相谏，如果像上两次那样发一通上谕申斥不仅无用，而且有可能激起众怒，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令王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数“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看

看是否有道理。这些大臣当然明白，慈禧的目的是要发动大家为她解围，同时也考验每人的态度，于是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连衔上疏，宝廷、黄体芳、李端芬、张之洞等一千大臣各上一疏，最后礼亲王世铎也具折上疏，反驳已经死去的吴可读，为慈禧辩解，这场风波终告平息。

精通权谋的慈禧为了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大度”，假惺惺表示“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决定给吴以五品官例议恤的礼遇，以平息人们的不满。李鸿章因此提

出由于吴可读死于蓟州，蓟州“士民”“倾心向慕”，请旨俯准为吴可读建专祠，供人景仰，藉以进一步安抚人心，以稍稍补救慈禧破坏祖制所造成的危害。

皇位承继程序、制度是任何王朝最重要、最核心的程序和制度。当这种事关王朝安危的程序都可以任意破坏、制度都可被玩弄于股掌之上时，对统治者造成的危害其实很难补救，而这个王朝离覆灭的命运也就不远了。

而且，当慈禧将皇位承继之规

都视为玩物时，足见其心中根本没有任何“祖宗之法”。然而引人深思的是，二十多年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拘禁当初由她亲自选定的光绪皇帝、残酷镇压维新运动时，其最重要的“理由”却是维新改变了祖宗“成法”、违背了“祖制”和“家法”、破坏了传统。

由于惟恐“维新”削弱自己的权利，所以她在 1898 年 9 月末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追杀维新党人。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绪

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愤，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愤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辩解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

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

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而此时慈禧俨然是“祖宗之法”的卫道士。

慈禧对待传统这两段截然不同的态度提醒人们，所谓“祖宗之

法”、“传统”等纯粹为她所用，都只是她的手中玩物。当“祖宗之法”威胁到她的权利时，她便将其弃如敝屣；而一旦她的权利受到变革的威胁时，她又转身成为“祖宗之法”的坚决捍卫者，不许人“任意妄为”“变乱祖法”。因此，人们固然要重视传统，但更要重视的是究竟是谁在掌控传统，又是如何利用传统的。

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慈禧是如何修颐和园的

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

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晚清政局腐朽透顶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可说已到朝不保夕的险境之中，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于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

不过，以慈禧的权柄独操、连皇帝都可玩弄于股掌上的“独尊”地位，从来是“朕即国家”、视举

国为其私产，可以从各方各面拨钱为自己建园修海，为何独独“看中”创建伊始的海军、偏偏要动用海军军费？个中缘由，颇耐人寻味。

慈禧性喜享乐，曾几次想重修刚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终因花费实在太巨且在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及李鸿章等一批王公大臣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下不了了之。此后，“修个花园”始终是她的一个“情结”。到了 1877 年冬，在慈禧的几次打压下，奕訢已经失势，奕譞却日渐得宠。或许是为了弥补

当年曾经反对重修圆明园之“过”，使自己在慈禧面前更得宠幸，奕譞就想以在昆明湖边设机器局的名义为慈禧重建与圆明园一同被焚、原建于乾隆年间的清漪园，但为人所阻，未得实现。不过，奕譞此后却一直惦记着为太后“修园”邀宠。耿耿此心，将近十年。1886年，慈禧借口即将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而这时早已主持军国大计、受命总理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衙门事务的奕譞奉慈禧之命巡阅北洋海防时却心生一念，找

到了为慈禧修园的最佳理由，赶忙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原来西汉时期，云南滇池有个昆明国，汉武帝为征伐昆明国，特在首都长安挖掘了一个大湖，名为昆明池以操练水军。而乾隆皇帝以为母亲祝寿、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据汉武帝挖昆明湖的典故扩改为“昆明湖”，健锐营、外火器营曾在昆明湖进行水上操练。在昆明湖练水师当然是“形式”大于“内容”，颇有些皇家观赏、娱乐性质，所以此制后来

便被废除。据此，奕譞在奏折中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经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当日即奉接“依议”的慈禧懿旨。这样，一年前刚刚成立的海军衙门就负责起恢复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名为“水操”，实为给太后修园，慈禧当然明白此意，所以才会当天即批同意。在昆明湖“水操”，皇上和皇太后自然要“幸临”，各种设施自然不能简陋，所以奕譞另一份奏

折中“顺理成章”地写道：“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因此“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经费自然从海军出。人人明白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翁同龢在日记中讽刺道：“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渤海”指北洋水师的主要

防区；“滦阳”是承德的别称，指实际是修建类似避暑山庄一样的行宫别馆。

1887 年 1 月末，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学典礼竟“不避嫌”，与专门为慈禧太后过生日受贺而建的金碧辉煌、气势宏大的排云殿上梁典礼同日举行；3 月中旬，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不久水师学堂的内、外学堂先后竣工，还安装有电灯、锅炉房等“现代化”设备。给“老佛爷”造园当然是头等大事，有关官员自

不敢有丝毫怠慢。如从外国购买、安装电灯多著李鸿章经办，而海军衙门当时还兼管铁路，所以李在1891年给海军衙门催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东铁路拨款信中，不能不首先详尽报告为颐和园买灯器情况：

“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他强调这批电灯是趁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时“令其亲往德厂订购，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这些灯具“鸿章逐加披视，

实属美备异常”，“机括巧密，料件繁多”，虽然“承霖原是安设电灯熟手，惟此系新式，与寻常不同”，因此还非这位德国教官亲自到颐和园安装不可；而颐和园附近西苑“更换电灯锅炉各件”是由一洋行代办，不久就可运到天津，

“闻器料尚属精美，一俟到齐，即派妥员解京，以备更换”。近代建造轮船枪炮、架设电线、修筑铁路这些于国计民生有重大干系的“近代化”事业阻力重重，认为是“奇技淫巧”、是“用夷变夏”，然而

慈禧对直接供自己享用的“洋器”如颐和园电灯、锅炉，却是要求用最先进的，并无任何顾忌。

在此，李鸿章先报告颐和园路灯情况，再要修路款，可见要款之不易。然而，路款仍未如数拨到。1893年，户部为替“老佛爷”祝寿，还是要“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因每年筑路专款恰为200万两。李鸿章无奈，只得照办，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关东铁路只得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停建。

1889 年，朝廷命令李鸿章将部分北洋水师官兵和水师学堂新毕业的学员共计三千多人调来昆明湖，将“湖水浅”的昆明湖当成“汪洋大海”，用小火轮作“战舰”在湖面驶来驶去，水兵们做各种表演，与岸上的陆军同向坐在南湖岛岚翠间的“阅兵台”上的慈禧摇旗呐喊，欢呼致敬。这次“阅兵”既显示了慈禧对海军的关心和作为全国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使其虚荣心又一次得到满足，同时又带有相当大的娱乐性、使性喜游乐的她兴奋

不已，更企图以此向世人表明“修园”并非为己享乐、真的是为了大清海军的建设！可谓一箭数雕。

从 1886 年到 1894 年，颐和园一直修园未停，究竟动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准确数字已难考订，因为统治者其实也“做贼心虚”，惟恐为世为人所知，所以早就由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各项杂支用款不用造册报户部核销。准确数据，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根据相关史料研究推算，多数研究者认为花费在二三十万两之多。总之北洋海军在 1888 年

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战前的六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门火炮。1891 年 4 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以后，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相反，这六年中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 2 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夫复何言！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

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其实，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已经判定。

慈禧等人当然知道如此修园会招世人强烈不满，因此在以光绪之名发布的上谕中专门强调：“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羨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所谓“羨余”，是指赋外无名杂税；“司农”原是汉代主管钱粮的官名，清代因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此处指

户部主管的“正款”。海军衙门当然更要强调并未动用购舰专款，而“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胪欢之地。先朝成宪具在，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未动正款”、“无伤国计”，“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恰恰“欲盖弥彰”，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

显然，只有以海军的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修园，才能巧妙地无修园之名而有修园之实。以慈禧

的地位之尊尚需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遑论他人！所以中国“官家”确实深谙此种“正名”之道，许多工程都是巧立名目，在堂堂正正的名目下其实是为了一己之利或某一小集团的利益。别的不说，当现如今在不少风景胜地看到许多达到豪华甚至超豪华“星”级水平的酒楼或休闲中心，居然是一些部委和政府机构的“培训中心”时，当在许多城市看到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时……确使人能直接感受到这种历史传统的深厚呢。

臣子都是替罪羊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都先后被杀，成为清廷的替罪羊，他们的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

杂，其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但更广的背景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的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虽然总的倾向主抚，但也一直摇摆不定，

时而主剿，时而主抚，长期没有明确的态度、政策。

清廷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是要利用义和团来根绝维新隐患。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并非易事，决策者是在反复犹疑、再三权衡利弊之后，才大胆作此决定。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慈禧后来就说是上了一些大臣的当。

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废黜光绪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这些守旧派本就坚决反对“西学”，现在更

加痛恨“洋人”。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

1900 年春夏，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义和团进入涿州，逼近京、津，行为日益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也拿不准义和团能不能为己所用、义和团和许多官员宣扬的“神功”是否真实，便在 6 月初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眼查证义和团各种各样“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

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惟恐赵舒翹动摇，也赶往涿州。其实经过一天考察，赵舒翹已明显看出所谓“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刚毅却力言这些神功“可恃”。赵是老于世故的官僚，与刚毅一党来往甚密，深知刚毅、载漪等实权人物坚持义和团神功“可恃”，慈禧本人实际也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和洋人对抗，而反对义和团的则触当道忌，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刚毅留在涿州与义和团商议合作之事后

才回京。赵毕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谎报，于是含糊其辞，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恃”，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此次复命对慈禧的决策有重大影响，慈禧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

而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

护使馆、传教士和教民。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攻打使馆。在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这次御前会议一开始，慈禧就

明确表示准备向“万国”开战，但又说“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等语。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明确表示：“拳民法术，恐不可恃。”一位满族大员打断他说：“拳民法术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议，臣特取其心术可恃耳。”内阁学士联元则坦率地说：“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此言一出，慈禧勃然变色，立即有人斥责道：“联元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时，光绪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驻外公使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

左侍郎许景澄，立即下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景澄连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等语。光绪深知万不能战，但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言，想借以“通洋务”著称的许景澄痛陈“开战”的严重后果，以打动慈禧。听

了许景澄一番话，于是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许景澄也涕泣不止。站在许景澄身旁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书，一直反对招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这时也“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慈禧见三人团聚共泣，大触其怒，注目厉声斥曰：“这算什么体统？”光绪才放开许景澄之手。最终清廷决定向各国开战。

清廷决定开战后，于 1900 年 7 月 28 日、8 月 11 日分别将主和的许

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人处死。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其实，慈禧一方面利用义和团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7月3日就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和。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

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为了让李尽快北上，朝廷又下诏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国难之中，李鸿章终于再任“总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权，而权欲极强的李鸿章竟得意地对下属自夸“舍我其谁也”。然而，李鸿章毕竟谨慎，因为现在义和团仍在高潮，顽固派大臣对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齿，他生怕此时进京自己会身首异处。尤其是许景澄等主

和派大臣被斩，李鸿章更不敢贸然进京，便以身体不好为名迟不赴京。

8月14日，北京城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但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8月20日，以光绪之名发“罪己诏”；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

“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

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同时不断催李鸿章尽快北上，9月8日在给李的“电旨”中朝廷终于承认“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再令李“即日进京，会议各使，迅速开议”。

此时，李鸿章才认为进京时机成熟，于9月18日先到天津与各方接触，于10月11日才到北京。由于列强提出朝廷要首先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作为“祸首”、并以此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

东巡抚袁世凯于 9 月 14 日联名上《请查办拳匪首祸王大臣折》，提出查办载勋、刚毅、载漪、赵舒翹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查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归罪于该王大臣”，是此折中的关键。

在随后几个月的谈判中，列强提出了上百官员的惩罚名单，在这场“朝廷”几被推翻的没顶之灾中，处于“风暴”中心的文臣武将，其命运自然更加悲惨，他们也成了慈禧的替罪羊。据不完全统计，在兵

败或京城被敌所破后自尽的有徐桐、崇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黑龙江将军寿山、庶吉士寿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翰林院编修王廷相、礼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国子监祭酒熙元等等。刚毅在与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礼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

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使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翹也被赐自尽。各级官绅一百多人受到不同程度惩处。

面对如此深灾巨祸，清廷不能不作个“交代”，在一道道谕中，“朝廷”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貽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

轻，加以惩处。”“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令鹵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慈禧则对人说：

“这都是刚毅、赵舒翹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

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没有丝毫自责之辞。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由“臣下”承担责任，因为“天子”“圣明”永不会错。

这种只责“臣下”不责“圣上”的观念影响殊深，时人后人评论此事时对赵舒翹都有严责，认为正是由于他未据实禀报才“酿成如此大祸”，若他当时“能将真情实况，

剴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义和团便“立时可以消弭”。赵“昧于理、盲于势，辱名丧身也宜哉”。“至今论国是者，追原祸始，犹叹息痛恨于赵之一言几丧邦也。”这些评论当然不能说不对，但谈何容易！许景澄等人对时局的判断、利害的权衡、灾难性后果的分析预测异常冷静、客观、透彻，而且明明是根据慈禧“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的“懿旨”坦陈己见，但他们不仅未能说动慈禧，反因意见与慈禧不

合，被斥为“任意妄奏”，竟惨遭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赵舒翹不敢据实禀报不能不说情有可原，仅仅严责赵舒翹不据实禀报显然有失公道。所以主和也好，主战也罢，谎报军情也好，据实直陈也罢，这些大臣最终都不免一死，这些大臣的悲惨命运，实际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

在惩办“祸首”确定后，赔款成为谈判的重点。最终 1901 年 9 月 7 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正式签订了以中国赔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主要内容的《辛丑条约》。签订此约两个月后，李鸿章即于 11 月 7 日因病去世。

附录

李鸿章一生大事简表

1823 年（道光三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北京参加会试，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1850 年（道光三十年），改授翰林院编修。

1853 年（咸丰三年），回家乡参与帮办团练，抵抗太平军。

1859 年（咸丰九年），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

1861 年（咸丰十一年），奉曾国藩之命组建淮军。

1862 年（同治元年），率淮军调上海，升任江苏巡抚。

1863 年（同治二年），奏准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培养外语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人才。

1865 年（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

1866 年（同治五年），为钦差

大臣，负责镇压捻军。

1867 年（同治六年），授湖广总督。

1870 年（同治九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1872 年（同治十一年），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实行官督商办。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因反对者甚众未能实行。

1874 年（同治十三年），与日本代表签订《北京专约》。奉召进京见恭亲王訢，力陈中国修建铁路

的重要，亦因阻力太大，未能实行。

1875 年（光绪元年），因“马嘉理案”与英国代表签订《烟台条约》。奏设开平矿务局，官督商办。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开始着手组建北洋海军。

1879 年（光绪五年），架设大沽北塘与天津之间电线。奏设上海机器织布局，官督商办。

1880 年（光绪六年），奏设电报总局于天津，1882 年改为官督商办。奏设天津水师学堂。

1881 年（光绪七年），未经奏

报修成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约 10 公里。

1885 年（光绪十一年），与法国代表签订《中法新约》。

1888 年（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1889 年（光绪十五年），朝廷正式同意修铁路，但否定李鸿章修津通路主张。

1890 年（光绪十六年），以日、俄等国窥伺朝鲜、亟需加强东北防务为由，提出修山海关内外关东铁路建议，获朝廷批准。

1894 年（光绪二十年），关东铁路因经费被挪作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庆典之用停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战争中国军队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赴日本谈判，与日本代表签订《马关条约》。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投闲散置。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访问俄、德、荷、比、法、英、美诸国。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同

情维新变法，暗中回护个别“新党”人士。年底被任命为勘河大臣，履勘山东黄河工程。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署理两广总督。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奉命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议和。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11 月病逝。